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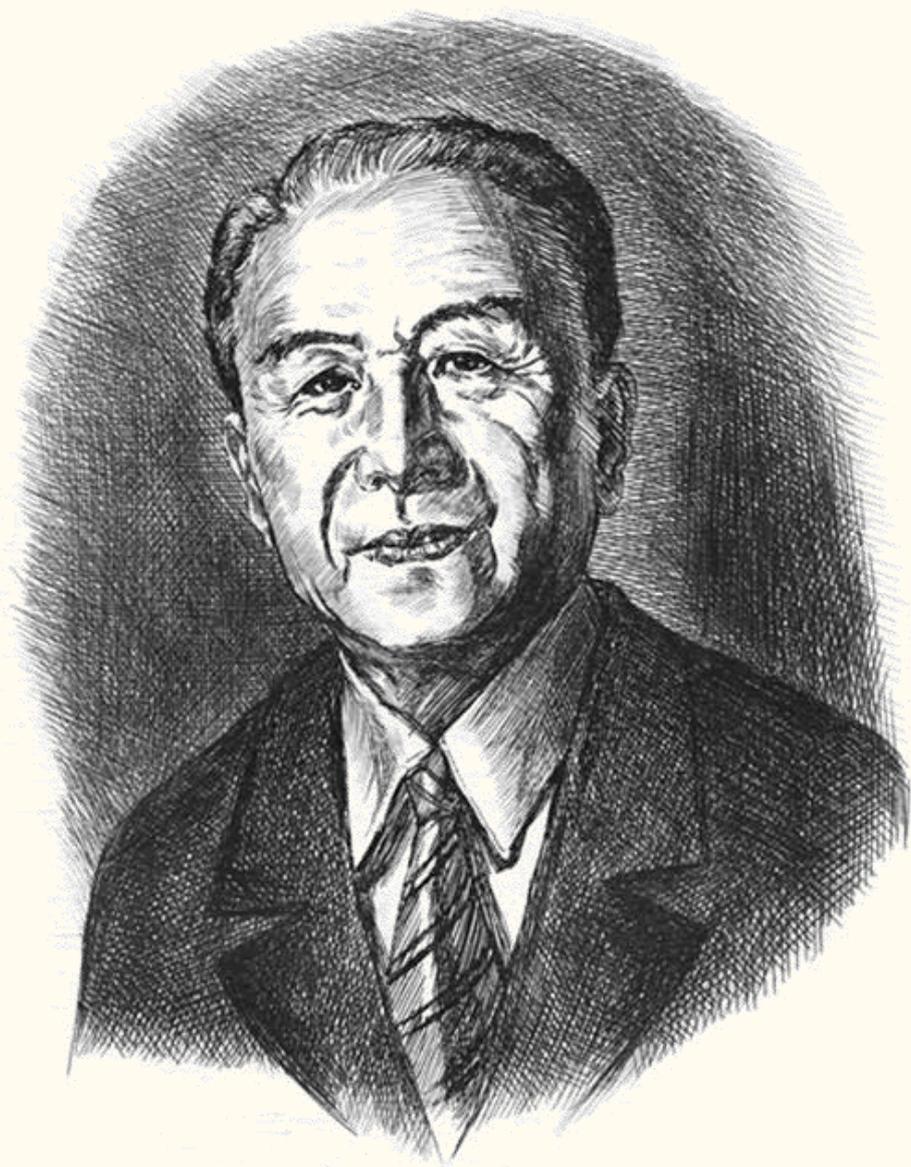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网专刊 (01)

# 史学在哪里

章开沅

近代中国网

[www.modernchina.org](http://www.modernchina.org)



章开沅先生，铜版画，2015，易明欣

## 目 录

- 一、史学寻找自己 / 1
- 二、历史的公正 / 6
- 三、历史的公正（续） / 10
- 四、史学与政治 / 14
- 五、对话与理解 / 18
- 六、历史的复杂性 / 24
- 七、广义的对话 / 29
- 八、贵在通识 / 33
- 九、离异与回归 / 37
- 十、境界——追求圆融 / 40

十一、史学的品格 / 43

十二、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 48

十三、走进历史原生态 / 58

十四、我的史学之路 / 63

## 附录

1、超越西方，超越传统，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章开沅教授访谈录（邓正兵） / 75

2、章开沅教授与中国近现代史写作（李平生） / 87

3、章开沅先生访谈录（魏文享） / 111

4、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

——章开沅教授访谈录（陈才俊） / 129

## 编后

## 一、史学寻找自己

这些年，我在海内外各地，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史学寻找自己。

史学之所以需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

早在 2000 多年以前，屈原的《楚辞·招魂篇》即已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偏僻的江南农村，由于缺医少药，还保持着“叫魂”的古老习俗。病者的亲属一人在自家门口反复呼唤：“××（病者小名）回来呀！”一人则在远处高声回应：“回来了！”其声摇曳凄婉，闻之令人心碎。特别是在严冬傍晚，这种悲切之声从远处传来，更增添天寒岁暮的几分苍凉。

如果不算夸张，我正是带有几分苍凉为史学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这决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即已给史学以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去年冬天辞世的匡亚明前辈，认为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讲的也是同一意思。

唐代刘知几也对史学与史学家提出很高要求：“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肯定刘氏“史才三长”之说，但认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更为强调的是“史德”，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以著书心术论史德，堪称一绝，实乃大彻大悟之言，至今犹

足以警世醒俗。

章氏既强调“笔削谨严”，又强调“别识心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独立思考。他本人就是这样，当时人“纷纷攻击”《通志》，“势若不共戴天”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再三为郑樵辩诬，申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

把引文的注释（“自注”）提高到史德（心术）的层次，章氏亦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职；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贗着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

学家的技艺》一书的导言中，用天真的小儿子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而这正是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布洛赫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一位年迈的工匠（布洛赫自称——引者）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行当值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此处用张和声、程郁译文，下同）为此他写了这本书，不仅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回答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质疑。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1990年秋天，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侄子到普林斯顿来探亲，经常开车陪我到远处旅行。年轻人性急，车速快而路又不熟，因此经常迷路。每逢这种情况，他必定问我：“我们在哪里？”于是我立即翻开地图，对照路标帮助他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确定继续前进的方向。如此反复多次，我受到某种启示，也不禁反躬自问：“史学在哪里？”

长期以来，史学走过的并非全是康庄大道。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

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过去，史学尽管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磨难，但史学工作者总算还有铁饭碗可端。现在的处境更为困难，简直是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若干大学的历史系已经改办旅游系、旅游学院，有的考古专业则开珠宝古玩店，为数不少的年轻历史学者干脆下海或从政，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

我决不认为史学现在已经是漆黑一团，史学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前进，优秀的人才与优秀的论著仍然在不断涌现，但消极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严重，我们怎能熟视无睹！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再注重史德或心术，而刻意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正是这些人最好的写照。我郑重呼吁史学同行认真阅读布洛赫此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部书稿，便为反法西斯伟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留下的是对民族与史学的无限忠诚，而这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史德或心术！

## 二、历史的公正

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四章“评判还是理解？”一节中，提出历史的公正这一重要命题。

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一是法官的。两者的基本共同点是忠于事实，但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其内心倾向于何方。

古往今来，实现历史的公正或公正无私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很困难的。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角色误认为是法官。“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布洛赫不同意这种做法，指出：“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

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今中国读者对此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对于这种空洞的责难与空洞的翻案的游戏，已经是太熟悉了。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这又使我想起清代学者崔东壁所说的一段话：“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考信录提要》卷上）可见，真诚历史学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

东壁还为我们讲了两个“以己度人”的故事。其一：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大半为不能通车的山路。有个和尚急公好义，主动募捐修路，因布施者甚少，“乃倾其囊以成之”。这本来是损己利人的善举，但许多人却议论说：和尚原意是想借“多募以自肥”，只是由于捐款者少，才不得已而拿出自己的积蓄修路。其二：东壁本人在福建任内，“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其清廉为当地百姓与上官所深知。回故乡后，住在山村，每餐不过一盂饭、一盘菜，

堪称清贫淡泊。但故乡之人反而认为是携有重资而不愿露富。所以东壁慨叹：“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

我也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吴县沈寿是清末民初刺绣大师，但体弱多病，家庭处境亦不甚佳。南通张謇担心其艺失传，不仅借宅供她养病，而且亲自协助她整理出《绣谱》一书。沈寿死后，张謇挽联极为沉痛：“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稍知张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贾，他不仅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抱负与成就，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素养与执着的癖爱。他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随后又创办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目的都是推广与发展沈绣的技艺。他还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聘请欧阳予倩主持戏剧改良，嗣后又在剧场建梅欧阁并刊印《梅欧阁诗录》，大力奖掖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样的年轻表演艺术家。所以，当时京沪两地许多著名演员或后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张四先生的品题与墨宝为殊荣。但是 1986 年某电视台为纪念张謇逝世 60 周年而制作的电视剧《杜鹃啼血》，却杜撰张謇与沈寿的爱情作为此剧的主线，看后令人啼笑皆非。这可能是出于票房价值的考虑，但确实使稍知张謇者有“以今度古，以

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与女人关系比较密切就必定会谈恋爱，而下海从商的大老板更必定会“包二奶”。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与故事片《林则徐》导演郑君里多次通信讨论。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对文学艺术持宽容态度，在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艺作者应能拥有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但艺术家亦应尊重历史，应该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应该尽量贴近其本来的性格、情操、心态，否则就不宜自称是历史剧。文艺家常常抱怨史学家在史实情节上的挑剔，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详细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学家并非出于忌妒而是由于谨奉“暴君”的指令，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评艺术家在史实描述方面的随心所欲。但是，艺术家也不必对史学家绝望，因为布洛赫在同一本书中又说过：“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在对人的执着追寻方面，史学家与艺术家是否也有灵犀相通之处呢？

### 三、历史的公正（续）

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希望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法官角色，但我们过去却长期习惯于用法官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谓“三七开”或“四六开”之类的功过区分，往往成为盖棺论定的套语。

这种传统来自古代史学的正统观。王夫之曾把它总结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划分正邪、是非、功罪的标准，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但船山不愧为颇具史识的大儒，他反对简单化的两极评判，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不可以人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

消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这番议论堪称至理名言，所谓“平其情”与“思其反”，都是史家应该特别注意的要领，否则便只能“效人之诃消而诃消之”，难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自然也就无从寻求历史的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被船山贬为“论史者之奖权谋堕信义”，而且“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的李贽，倒是船山平情思反的同调。他不满足于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反驳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藏书》卷四十）而且他还认为“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所谓此，就是前者具有旷古只眼的“独见”，而后者则不过是按古圣人以为是非的“文儒”。

类似的语言，我们可以在培根《新工具》一书中发现。作者在解释困惑人们心灵的“洞穴”等假像之后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他把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凭

依他人权威而形成的同意，斥为“苟从与附和”；并且强调：“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培根还尖锐地批评了16至17世纪英国的各级学校与各种学术团体：“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以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中译本，商务，1986）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三位思想家，在自主判断与学术自由方面的认识却如此契合，这除了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或前近代）以外，主要还是由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学术良知。用我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公正。

求实存真是历史公正的基础，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

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因此，由于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所厕身于其中的社会有许多现实因素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或干扰，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势、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他们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才能维护史学的自主与尊严。在我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史学当然无从也不应脱离现实政治，但两者之间应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决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在布洛赫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公正与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捍卫史学尊严与捍卫民族尊严在他的生命中融为一体。因此，法西斯的子弹只能结束其肉体的生命，却无从阻遏其精神与学术通往永恒。

## 四、史学与政治

历史学不会同政治学争地位，政治学也不会同历史学比高低。它们之间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平等关系，然而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

我相信，史学家与政治家主观上都是想友好相处、互相合作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不仅有共同目标，而且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大家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国土上与社会中。史学家其实是最好管理的公民，他们多半老实巴交，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爱惹是生非，充其量无非是想拥有一片可以独立研究与自由思考的空间。政治家当然比史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仅要忙于安邦治国，而且还要努力实现政党的和自己的宏伟目标，掌握政权的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国计民生。不能说他们不重视史学，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史学家应该如何协助自己安邦治国，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寻求历史借鉴。史学家也许会受宠若惊，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独立研究空间缩小的担忧；他们希望保持史学本色，尽可能避免泛政治化。

史学家并非不想与政治家保持一致，但他们多半恪守培根的箴言：“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还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法国年鉴学派是强调长时段研究的，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这是由于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时间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1995）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或者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与判断。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非也大有人在！林则徐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历史学家的共鸣。

因此，历史学家常被讥刺为迂腐，不通人情世故，简直是呆头呆脑。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泛滥的世界，史学与史学家受到冷落是必然的。但史学家历来并不缺乏自信。司马迁早在 2000 多年以前即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概，何等担当！西方史学家，特别是近世史学家，虽然没有什么载道、资治或惩恶劝善之类伟大传统，但也有不少情深意挚的自我期许。马鲁说：“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论历史认识》，转引自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把生命奉献给社会主义的布洛赫对史学更是一往情深。他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伟大的莱布尼兹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的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探幽索奇后的喜悦。”（《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上海，1995）

我毫无王婆卖瓜之心，因为史学的价值已是客观存在，且为古今通人所理解。我只想唤起政治家们的注意，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绝不是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小玩意儿。我们过去曾批评过胡适，说他不该把历史比作一串大钱或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但就在我们这些批评者中，有些人比胡适走得更远，把历史看成单纯是一种编纂手艺，而不必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史实依据。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变成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是为某一政策的出台作“学术”注解。

我在评论《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时曾经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自己真诚的科学追求，没有维护历史真实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甚至随时要看某些有影响的人士（甚至是外国人）的脸色办事，那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许多人（包括我们史学界）或多或少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内心的痛苦自然难以言说；而科学的尊严也受到肆意践踏，其痛苦更有甚于自己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这样沉痛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过来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重提这段往事，并非为了重新挑起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的争吵，仅只为了敦促政治家进一步理解史学家的内心衷曲，更加尊重史学自主与史学家的独立人格。我相信，只要加强相互沟通，增进彼此理解，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一定能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而那将是我们民族很大的福气。

## 五、对话与理解

我很喜欢对话这个字眼，因为对话双方理应处于相互平等态势。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都需要对话，更何况同一社会中的不同职业族群之间。

但我现在已不想再谈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因为做比说更为重要。我在这里思考的问题是：在历史学范围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也应对话？换言之，今天是否需要与往昔对话？

我历来对此持肯定态度。我注意到法国历史学家也曾有类似的思考。马鲁在《论历史认识》一书中强调指出：“文献在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朋友了解朋友的最好方法是对话，只不过与死去的朋友的对话乃是潜在与无声，也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所说的“潜在的共鸣”。布洛赫总是把理解看得重于评判。他语重心长地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恶人。在

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历史学家的技艺》）

四百多年以前，明人李贽早就有过类似体会，而阐述更为深切。刘东星《藏书》序云：“予为左辖时，获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释卷，终日抄写，自批自点，自歌自赞，不肯出以示人。予因异而问焉，先生曰：‘吾镇日无事，只与千古人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处，其心多有不可知处。既已觑破，实不与旧时公案同，如何敢以语人也？以故特书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尔。’”（《藏书》卷首）李贽与焦弱侯书对此亦有所说明：“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睹，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记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羨。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谪；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为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卷一）

用我自己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设身处地”，而为此就必

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这也就是马鲁所说的“‘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布洛赫所说的“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以及李贽所说的“与古人为友”、“与其人会晤”。这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一种进入融通的研究层次。保罗·利科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朋友了解朋友是平等对待关系，史学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是求知者而不是裁判员，在相当程度上应持价值中立态度，这样才能作客观冷静的理性探索。我们常说“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在撰写论著时却往往先入为主，预设结论，并且脱离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评判某些事件和人物。其实，这种情况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布洛赫就曾慨叹于法国史学与此相类似的毛病。他说：“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人类的现实生活就变成一张黑白分明的图画。”他还深刻地指出：“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话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历史学家的技艺》）

我特别喜欢布洛赫的一句话：“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

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同上书）所谓让位，即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为了进一步阐明自我思想“让位”的必要，布洛赫还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没收土地问题为实例：“在恐怖时期，政府废除了过去的法律，决定将土地分小块出售，而未进行竞争性的拍卖。此举的确严重损害了财政部的某些利益，为此，某些学者严厉抨击这一政策。要是他们敢在当时的国民议会中这样大声抗议，那才算得有勇气呢！在远离断头台的地方猛烈抨击当年的政策，这只能令人发笑，与其如此，还不如考察一下共和三年人们的真实想法。当时的人希望小农能获得土地，首先考虑的是救济贫农，以确保他们对新政权的效忠，而不是考虑预算平衡。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谁会在乎历史学家自己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能性。”（同上书）

对于当代中国读者，对布洛赫的陈述可以不作任何解释，因为在我们这里类似的情况太多。1964年秋天，报刊忽然开展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我试图从19世纪中期中国旧式农民思想的内在矛盾，来分析李秀成自述中那些往往自相抵牾的话语及其临终表现。却不料立即被戴上“为叛徒辩护”的大帽子，并作为折中主义加以猛烈抨击。我不

知道带头向我讨伐的这位作者现在处境如何，也很难想象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是否会慷慨成仁。我对他倒丝毫没有个人恩怨可言，所遗憾的乃是这种“判决”完全脱离李秀成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拜上帝会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太平军也并非人民解放军；他们既无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也很难形成坚定的信仰与铁的纪律。何况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其后期已经严重蜕化变质，忠王究竟应该忠于什么？忠于教义与纲领吗？他们曾经信奉的教义与纲领早已被几位最高权威人士解释得混乱不堪。忠于人民吗？当时农民似乎都是皇权主义者，而且忠王与其他诸王一样，早已远远脱离了平民百姓。唯一可忠的就是封他为忠王的洪秀全，而这个上帝之子早已变得荒诞不经乃至失去了理智，何况他在城破之日即已见上帝去了。国破主亡，兵败被俘，李秀成还能做什么呢？他几乎已无从自我选择，因为他的命运掌握在曾国藩手中。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就义或是投降。他或许考虑过投降，但清军杀降之举已经很多，特别是对像他这样的太平军统帅。他并不怕死，十几岁便开始疆场厮杀的一条汉子，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何况即令投降亦未必免于一死。他在写自述时，除力图为后世留下太平军的可信史实外，似乎还思索着如何争取时间。他允诺投降，但并非全无条件。他要求招抚旧部，实即借此保全随同自己征战多年的袍泽，同时也让

饱经战乱之苦的东南百姓早日得到一点休养生息。他的这些思想和行为诚然不足为训，但在当时当地却是有可能出现的。

我无意为李秀成辩护，出于职业习惯只是想寻求一种合理解释。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解释必定正确，而无非是提出供大家商榷。但当时的形势已不再需要理解，唯有判决与声讨才是天经地义。我由于被认定是为叛徒辩护，因而也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 六、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记录，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给史学家的理解带来很大的困难，上述法国的和中国的两个事例，已足以说明。

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社会环境本身的复杂，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这种复杂环境之中的人也非常复杂，特别是他们的思想与心理。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是认真研究而又较为严谨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正视历史的复杂性。王船山提出“论人之衡有三”，即正邪、是非、功罪。但他并没有把历史人物的评论简单化，却指出这三者相因而未必相值。正者的话多半为是，但也难免有非；邪者的话多半为非，但也可能有是。是者有功而未必如预期的那么大，非者似无功德可言而世人可能久已受其惠。（《宋论》卷六）他指摘司马迁挟私成史，为李陵辩解系“背公死党之言”，我们现今未必都能认同。但他确实是始终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不愿为正者有所掩饰。

布洛赫没有读过王船山的书，但他在历史的复杂性方面

体会得似乎更深。他说：“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多重的，有些人表现得特别明显。居斯塔夫·勒诺特尔大为吃惊地发现，在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主义者中间竟有不少慈父。有人把革命者描绘成凶神恶煞，以取悦中产阶级，即使我们伟大的革命家真的是嗜血恶魔，居斯塔夫·勒诺特尔的惊讶也无非暴露出自己思想的狭隘。有许多人愿意并成功地保持着多重人格。究竟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呢？”（《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还为我们举出若干事例：罗马皇帝弗罗里安曾经写过令人泣下的诗歌，但却时常鞭打自己的情妇；中世纪的商人白天公然违反教皇有关高利贷与物价的戒律，大发不义之财，晚上却跪在圣母像前故作虔诚地忏悔，或在晚年向社会捐赠巨额慈善金。布洛赫问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上帝惩罚，还是出于对上帝的真正虔诚？还是由于严酷的现实生活使其良心泯灭，借此略为缓解内心愧疚呢？（同上书）中国读者看到此处必定莞尔而笑，因为类似情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已经见得太多。

恩格斯前不见王船山其人，后不见布洛赫其书，可是他却从哲学高度论析了历史的复杂性。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藉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

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立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此前，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说过：“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而更早则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具体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因此英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比恩格斯早生近二百年年的王船山，则是从反面来表达类似见解：“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宋论》卷六）比恩格斯迟生近半个世纪的章太炎，也敏锐地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并形成自己的“俱分进化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并非单纯是一往直前地进化，而是“善恶兼进”，“乐之愈进，苦亦愈进”。以欧洲历史为例，从斯巴达、雅典时代到近世等级贵贱、上下尊卑的差别：“日见铲削”，人人皆有平等观念，这诚然是社会的进步。但随着文明的发展，金钱又成为新的不平等的表征，于是见利忘义，惜命苟安，

比比皆是。“风教陵迟，志节颓丧，其进于恶也，盖已甚矣。”

（《俱分进化论》）

似乎无需再作更多的征引，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成为众多中外学者的共识。问题是我国史学何以至今还存在着简单化的顽症？

一是由于传统史学的消极影响。我们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也容易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即以评判价值标准而言，正邪、是非、功罪的区分在过去曾有其合理性，但沿袭既久便难免走向僵化，终至无视历史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产生如同船山早已指出的那些弊端。我们长期涵泳其间，濡染甚深，因而也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过程简单化，表现在革命与反革命、路线斗争、左中右划分等方面。还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因素，也严重地妨碍历史复杂性的应有彰显。

二是由于史学的错误定位。千百年来，治史被看成是一种政府行为，司马迁虽居史官之职，犹蒙“挟私以成”史之讥。历代统治者都把史书看成是“资治”和“教化”（惩恶劝善）的工具，应体现为君、为臣、为民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近世以来，虽然有识之士多次倡导史学革新，但几代政府对史学的定位并无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

史唯物主义的广泛运用，史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面目一新，而且确实有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问世。但是，由于“史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误导，以及多次政治运动对史学的严重干扰，历史人物脸谱化和历史进程公式化的弊端仍然屡见不鲜。“四人帮”所惯用的“影射史学”，正是这一弊端淋漓尽致的恶性发作。

在一定时期内，史学实际上成为政治的仆从，成为某一政治方案、某一政治中心或某一政治需要的注脚。很难断定，现今这种消极影响在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某些史学家心中是否已经荡然无存。而这正是我仍然极力强调史学家应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历史学应保持独立的学科品格的原因之所在。

## 七、广义的对话

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话的必要，不仅是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潜在对话，而且还包括历史学者与其他各科学者之间的外在对话，我把它称为广义的对话。

潜在对话常表现为无言。戴叔伦《题三闾大夫庙》：“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与古人均形成超越时空的无声对话，亦即思想与感情的沟通，其贴近感正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史学家唯有如此贴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才能形成真正的沟通与理解。

古之学者颇重虚静，今之学者与历史人物对话也需要虚静。唯虚始能承受，始能容纳新知，用我们法国同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思维暂时从头脑中退出去，而把古人的思维让进来。静是一种心境，外在的环境可能匆迫烦扰，但学者的内心必须平静如水，超然物外而又沉潜于学，如此才可以有所悟解。李白诗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

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刘长卿诗云：“遇雨看松石，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寻南溪常道士》）这是诗人与山峦、溪水、松石、花草的无声对话，忘言正是有言，唯禅意玄妙难以言说耳！

山水本无知觉，经诗人想象而人格化，而有灵性，关键仍在作者内在的虚静。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想其所想，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布洛赫深知其中奥妙，所以才说：“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旨哉斯言！

从学科分工而言，历史学家虽然侧重研究过去，但也并非沉溺于古而冷漠现实，况且我们往往是以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为基础，逆行而走上通向往昔之路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已把道理讲得很全面。必须强调，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难以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史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但现代社会生活更为错综复杂，而历史学家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结构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了不断扩展对过去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历史学家便不得不经常向许多其他学科专家求助，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

学乃至科技专家等等。我把这种求助也称为对话，因为历史学家不是乞丐，并非零打碎敲地向其他学科索取若干急需的知识，这是学科与学科之间平等对待的交流与互补，在科际整合过程中历史学家并非消极地附和。我早就说过：“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他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蓬勃生机之所在。”（为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所写序言）

现今已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生活节拍更趋急速，对学者工作亦产生深刻影响。加以出版社急于抢先求利，职称评定决定于是否出书，项目资助更限定进度与结项时间，功利主义遂弥漫于学术界，而拼凑、剽窃之作日多。在这种情况下还侈谈什么虚静、对话、沟通、理解，必然会被一些人讥刺为迂腐、落后于时代。但我仍然深信史学自有其内在规范，实系千百年若干代人心血与经验熔铸而成的。顾炎武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将前人所铸精良之钱，舂铍碎散以成粗劣新钱，这一比喻对现代某些纂辑之书而言，仍然是惟妙惟肖，尽管方法已经从剪刀糍糊进化为计算机拼接。

强调职业道德与学术规范，诚然为当务之急。但更为重

要的，还是主政者应该按照学术规律来领导学术，为学术健康发展营造宽松正常的环境。现今有关学术发展与学者成长各项政策的制定，都有可以商榷之处，诸如学术职称评定对成果重量而忽略质，遂使率尔操觚乃至剽窃拼接者得以节节高升，沉潜于学并严谨撰述者反而被埋没。就文科而言，各级科研项目资助投入极少而要求甚高，各种手续、报表又极繁琐。对项目承担者而言，不啻经常处于鞭策之中，徒增紧迫之感而难入沉潜之境。学者或有因此不愿申报项目者，但又往往不容于所在单位，因为单位的评估指针体系中又有共获项目资助若干个，共若干元之类。如若不作彻底反省，加以必要改进，长此以往势必会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可悲局面。

## 八、贵在通识

《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氏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识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启超在谈史学革新时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指出：“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

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稍后，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全部贯穴熔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贯穴熔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与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短钉之学。

通识诚然可贵，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葑汉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变迁之迹，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只能在文字、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博览诸子，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涉猎《华严》、《法华》、

《涅槃》诸经也未能“窥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狱，囚系上海三年，专攻法相、唯识佛学，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由此得窥“大乘深趣”，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1906年出狱东渡，编辑、讲学之余，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终于在翻阅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十几遍之后豁然贯通，理解了语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经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义，而所见乃与传统笺疏琐碎者相殊。以后又为诸生讲《庄子》，间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意，遂深入阐析《齐物》，并与瑜伽、华严相互印证，顿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寻绎其精奥。1913年至1914年被囚于京师龙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论语》”，乃知“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又以庄证孔，居然可明“耳顺”（“六十而耳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谛，乃悟儒、释、道三家相异而终于相通。

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之一个案，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照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

格意义的通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 九、离异与回归

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也是文化史动态研究带有永恒魅力的重要课题。

特别是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又是一种类型。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所同化。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就东方国家而言，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离异，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富贫的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缺乏自信的民族自卑

感，乃至流于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情况则相当复杂，顽固派的守旧复古，对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种倒退倾向。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则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可能丧失，意在防止被西方文明完全征服与同化。这种回归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因此，在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需要适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我觉得，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应择善而从，相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而为此就必须首先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就不应该继续保持那些在半殖民地和农业宗法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畸形心态，而应该以更高的自信与更大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更不必忧心忡忡于民族文化独特素质的丧失，

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只有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大竞技场上奋勇拼搏，才能荡涤那些年深日久的陈规陋习，并且重新焕发出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与创造潜能。

我们过去已经对世界作过伟大的贡献，今后应该为世界作出更为伟大的贡献。我们既要广搜博采世界文化中的一切精英，更要把新的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我们既没有理由自满，更没有理由自卑，排除一切外在的与内在的、行为的与心理的障碍，勇敢而又稳健地走向 21 世纪吧！

## 十、境界——追求圆融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实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申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从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陈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熔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圆融”。天台宗有“三谛圆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圆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

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总之，唯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愿聆公论。

## 十一、史学的品格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品格。

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

求实存真很难，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搜集应有的相关原始数据，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

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因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都是出自个别或若干人的手笔，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性，如为尊者、亲者讳之类。即令笔者态度较为客观公正，而记忆错误乃至笔误、刊误之类也比比皆是。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

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还是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说：“研精沉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虽然说的是广义的国学，但对史学完全适用。更可贵的是他坦陈心曲：“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余也。”并且自我反省：“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再与人论国学书》）

其实，顾炎武早就说过这层意思，而且说得更为形象。其致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

（《亭林文集》卷四）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乃《日

知录》经历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的缘故所在。

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王国维对此体会很深，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这些话都是大学问家的肺腑之言，而为世俗庸众所未必理解，所以观堂才劝真诚治学者不要在乎什么“迂远烦琐之讥”，并且不要逃避“深湛幽眇之思”。明乎此，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境界：（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治学诚然艰苦，但苦中又有乐，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那就是最大的欢悦。

史学是极为古老的学科，从总体上来说又是相当成熟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学评论对史学家都提出很高要求。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也肯定刘氏“三长”之说，但更为强调“史德”。他说：“能具有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人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

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是由于当时已出现学风败坏现象。他说：“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职；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如果联系现今的学风状况，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说的。他所说的“自注”，不仅说明“取”材的出处，还要说明“去”材的缘由，这样才可以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学养、眼界和功力。而把“自注”提高到“心术之诚伪”来看待，这与现今所讨论的学术规范更是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诚实，这是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诚的学者的共识，并非任何人主观强加

的苛求。史学如同一切其他学科一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投机取巧，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二、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途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变化，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毕竟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很难维持长久。

三、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政治压力与金钱引诱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君主专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学的忌讳乃至作伪，而商品大潮的冲击则诱发学风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

因此，现今学风败坏尽管由多种因素促成（包括某些错误政策导向），但一切真正的学者应该站稳脚跟，坚守规范，道德自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气概推动良好学风的发展。

## 十二、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 (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史学的被冷落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即已断言 20 世纪实现了全球的技术统一，并且期望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追求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则至今连绵不绝；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恐怖时代。在这一百年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剧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与现实都证实了中国学者章太炎在 20 世纪初呼唤的警世预言“俱分进化”，意即善与恶同时并进！

汤因比痛感西方人长期片面追求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酿成自我中心、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的恶果。所以，他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藉以弥补现代人类文明的缺失。但是，他却未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各国或先或后也走上这条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现代化道路。

人类已经处于严重的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直至可能自己毁灭自己。人类不应该继续自相争斗、自相残杀，有良知的人们应该首先联合起来图谋自救，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纠正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不要相信那些诸如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凶险预言，也不必沉溺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止无休的争论。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中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越，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

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 (二)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详近略远，很大部分写的是现、当代史，而且在“究”和“通”上下功夫。其用意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志古所以自镜。

法国当代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更为明确地揭示史学的参与意识。他说：“法语、英语、德语等都以同一个字眼用于历史真实和我们取之于历史真实的知识。hisoir、history、geschichte 既指人类的变异，又指人们为他们的变异而努力建立的科学。”总之，“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意识的范围》）。

大约在此二十多年以前，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小儿子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认为：“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为了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把题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一部书稿遗留给人间。

布洛赫反对以狭隘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用”。他说：“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

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他所说的利益主要是指超物质利益的精神层面，如求知欲的满足、探幽索奇后的喜悦、历史经验的汲取、良知与历史使命感的培育等。他说：“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战前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

布洛赫认为历史之所以持续存在，就是因为它有“普遍永恒的魅力”。他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现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布洛赫选择了史学，并且为此奉献一生，他认为“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布洛赫自我认定的“天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史学的奉献；一是对社会的奉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历史学家，既拿起笔也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

第一线。他未能看到自己上述书稿的出版，也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他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且以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回荡千古的奉献之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er）不仅是布洛赫史学的志同道合者，而且又是他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密战友。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让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这里说的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布洛赫可以说是已经进入这个境界的光辉榜样之一。

在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也有一批历史学家参与了创造历史，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吴晗、尹达、黎澍、刘大年、胡绳……他们的一生同样体现出史学可贵的参与意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演变。所以我好几年以前即曾有感而言：“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 （三）

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历史学家。但前后两种参与含义不尽相同，如果用相近的英语词汇来表达，前者或可用 participate，意即参加，亦即亲身实践；后者或可用 enter，意即进入，亦即感悟贴近。

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早就说过：学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此前，清人崔东壁早已说过类似的话，但却是从反面阐明此义。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指出：“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见于经者是否都那么“纯粹无可议”，这自然不可流于盲从；但不可以今日之己度往昔之人，却是无可动摇的真谛。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马鲁（Henri Glrene Marrou）也有

类似说法：“文献在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最机敏的考证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能够唤起潜在的共鸣。因此，我们更应当感到担心的不是被愚弄，而是不理解。”（《论历史认识》）他所说的理解当然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通过历史文献，特别是通过文献的考证过程来达到这种理解。因此，“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论历史认识》）。

年鉴学派布洛赫所见略同，强调理解重于评判。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以法官自命，而“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人类的现实生活就变成一张黑白分明的图画”。因此他明确指出：“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得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活剧的内在原因就要困难得多。”（《历史学家的技艺》）

我特别喜欢布洛赫的一句话：“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让位，即为古人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借助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其心灵深处的奥秘。这与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与立说

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寓意大体相同。这与他的本国同行马鲁所主张的“理解‘其他’（古人）即需要我们抛弃个人好恶，以便把其他作为其他”，也是一个意思，尽管他们并非同一学派。

理解的最好方法是与古人对话。其实早在四百多年以前明人李贽就有过这样的体会，而且阐述得比西方史学家更为深切。其《与焦弱侯书》云：“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睹，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记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羨。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谪；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为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刘东星为《藏书》作序亦云：“予为左辖时，获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释卷，终日抄写，自批自点，自歌自赞，不肯出以示人。予因异而问焉，先生曰：‘吾镇日无事，只与千古人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处，其心多有不可知处。既已觑破，实不与旧时公案同，如何敢以语人也？以故特书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尔。’”

“与古人为友”“与古人会睹”，以及我们现今常说的“与古人对话”，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

一种进入融通领悟的研究层次。朋友与朋友的对话应是平等对待关系，史学家在研究初始阶段是求知者而不是裁判员，在相当程度上应持价值中立态势，这样才能作客观冷静的理性探索。真实性是历史的生命，正如马鲁所言：“当历史具有真实性的时候，其真实性是双重的，既包括往事的真实性，又包括历史学家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论历史认识》）而只有让理解融汇于真实性之中，这样才能实现史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或许也可以借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话来表述：“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 （四）

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的主要“天职”乃是研究历史而非其他。我们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



《章开沅文集》（11卷本）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 十三、走进历史原生态

我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无非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如果说商会史的研究是二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数据。我从中产生一些联想，“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学术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

现在我们用史料最大的缺陷、当然也是最方便的就是用计算机。计算机储存、计算机检索，确实很方便，但不一定容易消化。由于没有弄清楚史料在整个历史数据中的位置，往往不了解上文和下文，它的来龙去脉没有弄清楚，就凭这样按自己的框架、自己的思路去拼凑，结果使得写出来的论著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现在学术界弥漫着急功近利之风，有些人写文章根本不注意搜集原始资料，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

自己掌握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先有观点，后找材料，不仅忽视了史料的原生态，而且颠倒了史学研究中论点与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

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形象地比附对资料的考订与排比。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以顾炎武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才“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日知录》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之缘由所在。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搜集应有所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但要确保重要的史料不漏网。苏州档案馆把三千五百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又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当然，史料选辑、汇编在历史研究中起

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史学家来讲，对诸如此类的史料汇编应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因为，任何史料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态。史料编纂的本身都有一个框架，一种导引，编辑本身就有个思路，选什么，不选什么，都是建立在这个思路基础上的，你一看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很清楚，编辑者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但是，编者的判断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判断；否则，研究者便只能跟着那位史料编辑者，根据他导引的路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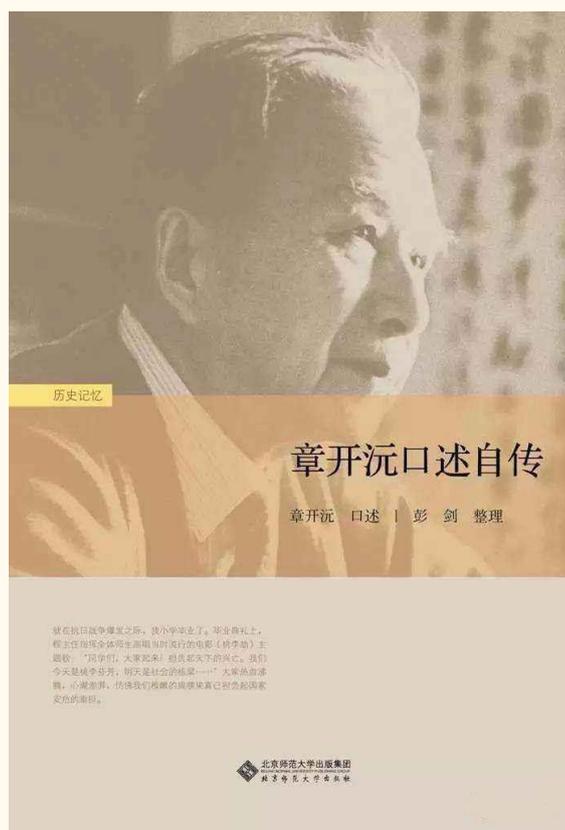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史料，尽量利用原生态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我不是史料至上的学者，我也经常做一些解释，做一点宏观的判断，也做若干评判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地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任何人都有主观，但是要努力做主观因素较少的人。过去我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

但是，时下有些学者似乎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求实存真的

学科品格，将方法、模式、范式之类的东西置于首位。当然，对学术史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走过的路，避免重复，使现有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史学研究的方法在不断更新，有人从范式的角度总结出 1949 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的转换。一方面，我们要允许这种探讨，新的范式不一定就是对已有范式的颠覆；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它的泛滥，动辄某某范式、某某模式，好像只有某种范式处于最高位置。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创造某种范式，在研究的中间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路径，而很多范式就是在研究中间成就的。

当前不少年轻学者容易轻信外来的东西，以为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实际上，西方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新的，有些是很老旧的。即使是新的东西，里面也有不同的层次，有些层次比较高，有些层次比较低，也还要有所区分。要看是不是好货，好货我们就借鉴。就是借鉴，也不能当作“拐杖”，像过去那样，离开了经典作家的话语就不能写作，那叫做“拐杖”。我们现在对很多西方书籍进行译介，西方的学术思潮大量涌进中国，这对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交流是双向的，不能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就是新的，这只能使中国学术界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会用甚至

完全用西方的范式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用中国的历史来证实据之于西方的所谓模式的普适性。我们不应有中国过去半殖民地那种民族自卑感，要有自己的分辨力，首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保存、利用好。我曾经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



## 《章开沅口述自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 十四、我的史学之路

今年4月，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到家乡浙江湖州春游，又到章氏宗族的聚居之地——荻港村。我虽已多次回到故里，但这趟返乡之旅仍有很大不同。这是一趟纯粹的私人旅行，没有任何公务活动，让我可以从容、安静地感受家乡的草木菁华，人文精粹，先辈行迹，乡里情谊。所内的同仁对于这趟行程似也十分享受，湖笔之乡，烟雨江南，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时尚的现代城市融为一体，对于研习历史的人来说，自然会有与常人不同的心灵感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共绘着一幅美丽的江南画卷。虽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江南，或人文的、自然的，或浪漫的、婉雅的，或富足的、平淡的，或时尚的、古朴的。但无可否认，传统的人文积累和今日的经济飞跃，更增添了江南的魅力。

在荻港小住的两日中，我也看到了家乡的“历史变迁”。晚间漫步，原本长满在记忆中的芦苇就在面前摇曳，原本古老的村庄在楼台灯影中又变得鲜活，京杭运河边的商埠已经没落，村民们自己集资建设的花园——“崇文园”中却是花木葱茏。这样的情景，与《章氏家乘》中的记载有天

壤之别，也让我倍感欣喜。其实，我幼年起就“流浪”在外，对于家乡及家族的了解都非常贫乏。青年时期也是“东奔西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更是难得清闲。直至晚年才回乡稍多，寻踪觅影，访旧探新，从中也可深刻感应到个人、家族、家乡与国家命运共振的脉搏。

荻港虽是著名古村，但地少人多，稍有志者都出外经商、游幕谋生，章氏先祖亦不例外。到我的曾祖章维藩时，他以监生报捐州同身份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新疆南北两路。后以军功授职，历任安徽抚署文案、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到甲午战争后，曾祖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面粉工厂之一。此后又在安徽当涂开采铁矿，从此在安徽芜湖安家，我就是在芜湖出生的。到我出生之时，家道已经中落，但这种家世背景成为诱发我对张謇研究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也让我对于此后的绅商及资产阶级的研究有更贴近于实际的理解。

不过，无论是张謇研究，还是辛亥革命研究，都不属于我年轻时期的生涯规划之列。中学时期，我酷爱的是文学，喜读杂书，苦练文笔，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成为文学家，是我这时的梦想。大学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但并未树立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之外，仍痴迷于文学作品之中，对于社会科学书籍也兴趣

有加。参加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后，写时评又成了课余爱好，曾写过《火车抛锚》的政治讽刺诗和《漫话金圆券》的政治评论，其中虽不无“少年孟浪”之处，但却颇得好评。年轻时豪气干云，在激情如火的革命岁月，觉得当文学家已经过于平淡，新的理想是当一名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之中采访报导，那才显得出热血男儿的本色。

194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舞文弄墨的所谓“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现在想来，大学时本不在意的历史专业背景早已决定了我今后的道路，这些本都不在“人生规划”之中。套用一句现在时髦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在很多时候，这句话还是有符合“辩证法”之处。

1951年，中原大学与武昌华中大学合并，随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就在此校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史学研究生涯。虽然这不是自己的原本志愿，但是我们这代人是浪漫而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我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是在“结婚”之后“恋爱”，终于在教学和研究之中找到了“幸福”。

初期的研究并没有专一的领域，可以说是完全为教学服

务。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提醒我认识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后来，我将主要精力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1年，我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其中《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作为会议唯一一篇代表性论文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全国政协文史数据委员会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系统收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张謇研究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书稿《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不过，这本书迟至1986年方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之旅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师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但是，对刚刚走上学术正道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1964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到“重点”批判。不许参加学术讨论，不许发表文章，不许为自己申辩，这“三不”批判让我领会到“学术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厉害。批斗之苦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为痛苦的是学术研究就此停顿长达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我才重操旧业，

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在1981年全部出齐，作为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不过，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辛亥革命研究一个新的起点，不足与疏漏之处仍多。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新起点。长期受到困压的学术激情突然喷涌而出，我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也得到中外学界的积极响应。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虽然后来研究兴趣有所转换，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作为一个“老革命”，虽然没能扛枪上战场，也算是研究了一辈子“革命”。

辛亥革命的学术内涵显然不能用政治标准加以分析，我对于当时过于教条式的研究很不满意，提出要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重视“社会历史土壤”的因素，加强对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群体及社会阶层的研究，将“阶级”、“革命”等分析概念具体化。这些倡议分别得到一些

年轻学者的实践，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都曾经先后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等，对于相关的学术领域及个人的学术成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00年，我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大体上是对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在这一时期内，我也曾侧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加以研究，主张将比较的视角与历史社会土壤及文化心态结合起来，去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此次重版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这本书，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宏观审视，也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工作的一个总结。

现在谈到教会大学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少学者说我有倡导之劳，其实进入这一领域，既有必然，也有机缘。研究历史的人似乎不应多谈“宿命”，但这两个主题确实都与我在金陵大学求学有关，其间巧合之处甚多。金陵大学是基督教外国差会在华设立的大学之一，而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紧密相关的“贝德士文献”的主人翁是我在金大的老师，他

本人就是美国传教士。

1984年，我出乎意料地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的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开始了六年的校务行政生涯。大学校长责重事繁，很难设想在学术上大有作为。不料1985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突然来访，建议两校合作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子健毕业于燕京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大学），他对我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就说服我接受此建议，并且很快就付诸行动。1989年6月在华中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被中外学界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一块里程碑。我想，如果没有子健的来访，我是不会主动选择教会大学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其实最初主要是南京的学者从事此项工作，我虽然关心但却无力顾及。1988年暑假，我应邀到纽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难得上级领导慷慨给我一个月学术休假。我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史历史档案，却在无意中发现“贝德士文献”，其中包含大量南京大屠杀源文件文献。但当时校务极为繁重，只能心向往之，惟留牵挂。直至1990年卸任校长职务，再访耶鲁，才如“故友重逢”一般，系统阅览了总量达一千余卷的贝德士档案文献，并将南京陷落时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

与负责人的贝德士对日军罪行的实录与报导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先后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著作。其时，正值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真相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升级，这些著作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出版以后就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个人来说，我做这些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并没有任何应时应景的想法，何况 1997 年以前有的书在出版时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收藏，更为丰富的是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全宗。对教会大学，我在金陵大学时就有切身的感受。在出国以后，才了解到西方学界对于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十分重视，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倾思潮影响，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内地学者对此鲜有涉足，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教育的演变是个缺陷。我觉得中国也有开展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不断呼吁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并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连续召开了多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 年，在华中师大成立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自国外征集并购进大批原始文献资料，规划研究项目，团聚研究力量，与海外学者

广泛交流，到现在可以说初有所成，教会大学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兴领域。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有幸成为对外学术交流的先行者，衷心希望能够将中国的学术成果推广到世界，也将世界史学的精华引入到中国，因为开放的学术体系才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创新。我也常自认为是一座桥梁，努力促进沟通东西文化，增进相互了解，共同繁荣学术。兹事体大，困难较多，欣慰的是自己多少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从“北美萍踪”、“韩日纪行”到“台港情缘”（《章开沅的老照片》标题语），讲学访友，辩难析理，虽有艰辛，但也乐在其中。眼见辛亥革命史研究跨越海峡两岸，南京大屠杀研究得到日本正直善良之士与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的认可，教会大学史研究也成为中外学术交流极为频繁的载体，旅居的孤寂，奔走的苦累，也都烟消云散。2001年，得海内外学术机构及师友的支持，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每年定期聘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举办暑期青年学者研讨班，也支持有关学者的研究项目，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对话的一座平台。

史学研究曾经给我带来磨难，但更多的是给我带来快乐，个人命运与国家及社会的变迁实在是密不可分，以研究历史为业者，理应读懂自己生存的时代。历史学家可以给历

史以多种解释，却不能背离时间已经划过的轨迹；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真相，更不可外在于自己的时代。我历来提倡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品格，“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探真求实的精神和堪留后世的学术精品来丰富民族的文化；我也提倡参与的史学，赞同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用史学研究来服务于社会的进步，让大众能够有了解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智慧、熟知民族文化、理性认识社会的选择。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参与并不矛盾，学者的参与如果失去了独立客观的品格，也就失去了其社会价值。我参与社会活动较多，经常应邀演讲。我的演讲也比较受欢迎，当然也有人不欢迎，因为我常常会唱一些“反调”。快到 2000 年的时候，别人欢天喜地迎接新世纪，我泼冷水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区划而已，“善亦俱进，恶亦俱进”，1900 年就没有什么祥和美满。别人大讲“文化创新”，大拆大建，我偏偏又来讲“守旧”，不守旧无以创新。不过，听众的反应说明我这个学者的声音还是受到重视的，也是他们需要的。在学术和社会的层面上，面对许多的“现代病”，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缺失。

史学及史学家的价值固然有待于社会去“发现”，但是

否具有发现的价值、如何发现仍取决于史学家本身。今日之史学虽然不是显学，但即使相较于以往的任何时期，其“行业规模”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产生的史学作品更是难以数计。但在不良学风影响下，不注重发掘、运用原始史料的浮躁之风也日益显现。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也不排除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历史现象，但一直将实证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石，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态度。失去客观实证的研究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也失去其长久的价值。

近几年，我又提出“原生态”史学的概念，在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原生态”本是用来指事物的原始生存状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纯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即艺术家们应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谣，以期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我将这个流行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首先是想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史论须由史料中来，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何而来、背景如何。即便是最原始的资料，也是当时的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经过整理及文字加工后的记载，而这一过程掺杂了较多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因价值观的不同、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可

能就会有不同的记载与评价，因而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要经过反复的比对与考证，才能使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走近历史的“原生态”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即尽可能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既抱理解之同情，亦抱客观之态度，因为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在强调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的时候，也要警惕“范式”的泛滥。在研究过程中，如动辄某某范式，反易使人的思想禁锢其中。探故求真，何其难哉！

对于史家来说，在时间的某一刻，历史的原生态只有一种；但对于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祖居荻溪摇曳的芦苇，老家芜湖青弋江畔的垂柳，保存泛黄的家乘，童言无忌的诗文，川江纤工的号子，“奉命挨批”时的大字报，普林斯顿的蟠音客舍，演讲台下热情的掌声，个人生活的印迹与国家的历史一样多难多彩。或许我可以将之写出，但是，真能体验其情其境者，惟己而已。我常说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孰言不是？

漫谈杂言，是为自叙。

附录：

## 超越西方，超越传统，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邓正兵

世纪之交，中国进入又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的注意。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中国史学研究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二是把国外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入中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最近，他又发起召开了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内外百余位学者聚集一堂，展开了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会议期间，记者就会议主题采访了章先生。

### 文化革新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

记者：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这不由使人联想到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请问您为何会注意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这一课题？

章开沅：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就近代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的性质、基础、环境机遇与终极目标不同，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又应如何积极而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促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若干有益的东西。同时，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变迁，固有的文化必须革新调适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文化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环境变化，在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何况，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环境，已不再是庸俗社会学者所设定的仅仅是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如果进一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会结构更深的层面。忽略文化转型，便不是完整的社会转型，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成功的社会转型。我们在谈社会转型时关注文化变迁，正是为了突出文化层面的重要，也是为了呼唤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加加强对教育文化的重视。

## 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交替出现的两种趋向

记者：如此看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二者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相互协调或扞格，您曾提出在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会出现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请介绍一下好吗？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特别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离异与回归。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又是一种类型。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模仿、学习与趋近西方近代文明；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记者：在近代中国，离异与回归这两种文化趋向是怎样交替出现，怎样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的呢？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这两种文化趋向对近代中国社会产

生深刻的影响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中国不存在文化回归的现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现的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离异实乃微乎其微，以致很难引起众多的注意。60 年代以后，随着维新思想的发展与洋务事业的兴办，出现了同传统文化比较明显的离异。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已经引起旧势力比较强烈的反应，关于同文馆与修建铁路的争论，就是离异引发回归、回归阻止离异的具体表现。但是，真正具有相当规模的回归现象，则出现在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全面展开以后。慈禧太后的政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庚子事变，是对戊戌变法的全面反动。民国建立后，全国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民族生气又有所振作。但是，在顽固守旧势力看来，这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与灾难。他们煽起一股又一股的思想上的复古风潮，并带出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复辟逆流。辛亥革命有限的胜利成果也就逐渐消失殆尽。

记者：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近代文化这种离异与回归现象？

章开沅：就东方国家而言，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产生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

归，情况则相当复杂。顽固派的守旧复古，对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种倒退倾向。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则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与同化。这种回归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要适度，即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 要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把握和判断文化的价值

记者：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涵义和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也建立了多种不同的体系，请问先生是怎么看的？

章开沅：我想需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地域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汉族文化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长期兼收并蓄，已吸收涵蕴了许多兄弟民族文化及外国文化的因素与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

一，历经沧桑，活力犹存，其漫长的发展诸阶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儒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对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它在不同阶段又与墨、法、道、佛诸家碰撞渗透，形成儒学本身的演化流变。及至鸦片战争后，情况更为复杂，中学与西学既相冲突，又相融合。五四运动以前有进化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入，五四运动后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传入，这些外来思想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并且以不同地位包摄在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只有认真地、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并且与外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获致某些切合实际的有益结论。

记者：对西方文化是否也应作如是观？

章开沅：是的。所谓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内容之广泛与内部差异之悬殊，与中华文化相比较，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美国文明或美国式的文明。美国虽然得天独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它的文明并非西方文明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新大陆的支脉，也是各国移民带去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综合。所谓西方模式，其统一性是相对的，它统一于许多国家的千

差万别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把这一模式简单化、绝对化，以致闭塞自己的视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记者：那么，把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归结为“儒学+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看来也有失偏颇。

章开沅：作为亚洲国家，西化最早而又收效最大的当数日本。但日本向西方学习并走向现代化，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所谓“脱亚论”曾经一度颇具声势，但“和魂洋才”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并未完全脱离东方儒学文化圈。当然，“和魂”并非单纯是已经日本化的儒学，还包括其本土的神道之类。在日本，真正堪称大幅度西化的，是在战败并被盟军占领以后。尽管有人将日本列入“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实际情况却是离开传统儒学文化愈来愈远，特别是青年一代。当然，这并不排除日本仍然保留着不少旧的传统的东西，乃至亚洲人民最痛恨的军国主义的残余。我曾经多次到香港、新加坡等地考察，也曾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广泛求教，试图能多少发现一些儒学对于振兴经济的神奇作用。但是很遗憾，这很难得出儒学导致经济起飞的结论。我的初步认识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主要取决于机遇、市场、决策与机制，与儒家文化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联。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经济起飞以后才在儒家文化方

面寻求理论理解，或者至少是经济起飞为鼓吹其所谓“新儒学”提供了事例根据。

记者：中国大陆有着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为深厚的儒学传统，如果儒学有促进经济起飞的神奇作用的话，那么，最先起飞的应该是中国。但是，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呈现不同的特点，这有没有文化层面或国民性方面的原因？

章开沅：中国与日本比较，除地理、自然诸因素外，显然有民族自身的特点，一是泱泱大国的宽阔胸怀，一是文化悠久的稳健凝重。日本却善于模仿而缺乏创造，灵活机警而流于浅薄。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从总体而言，中国的情况仍然比日本优越。但是在西方文明强烈的冲击下，日本人的浮躁浅薄转化成随机应变，而中国人的稳健凝重倒成为改革过程中的严重心理障碍。后来日本从妄自菲薄转为企图凌驾世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出闹剧，酿成悲剧。而中国一改稳健凝重为浮躁和急于求成，屡次见异思迁，不断地把众多外国模式先后引进中国，每遇挫折，即思更换，使中国出现了反复争论和多次的改弦易辙，早期现代化进程缺乏连贯性。可见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的历史效应往往是复杂的，它们和历史机遇进行双向选择，在不同的条件下产

生不同的效应，很难用单一的尺度来判断其价值。

记者：过分强调所谓日本和“四小龙”模式中儒家文化的作用，是否说明在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缺陷？

章开沅：近些年在现代化问题研讨中出现一种倾向，即单纯以经济发展程度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各种文化的价值。而且往往是只注意眼前却不顾及长远，这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不能只注意经济发展水平而忽视其他各个重要方面。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就永远那么先进，社会结构就永远那么合理。对于二战以前的德国、日本和今日的日本、美国，都不应因其兴盛而褒之过高，也不应因其一段时间的衰落而贬之过低。决不能认为日本已经妥善地解决了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生活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的整体结构来孤立地谈论文化，文化可以对经济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但说到底还是经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以强者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  
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记者：既然日本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归功于儒家文化，

那么中国的挫折和失误也就不应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在构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时，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和借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作用呢？

章开沅：在研究讨论传统的同时，反思我们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是万不可忽略的。如果把现实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全部归咎于传统文化，那就未免失之偏颇，等于是自己没出息反而怪祖宗不好。传统永远在发展变化，它作为自在之物，无所谓优劣。后人应该以强者（优越者）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肩负传统包袱，而是超越传统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来选择传统中的有用部分，摒弃其消极或有害的部分。按离异和回归的模式来说，离异须抗拒其惰力，回归则须认同其活力。

对于西方文化也有接受者主体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问题。应该用强者（优越者）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即使在两相较量中遭到失败，也要善于利用“失败者的优势”，在精神上转化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者，放手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在两者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整合、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

记者：我们将要建立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究竟有何特征，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章开沅：我觉得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

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挥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而应该是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为此就必须首先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不应该继续保持那些在半殖民地和农业宗法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畸形心态，而应该以更高的自信与更为宏伟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中国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

记者：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人首先着眼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后现代症”问题，并企图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找药方，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章开沅：对中国人来说，所谓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多少有些像是富人的忧愁，或是超前的时髦与奢侈，中国社会当前主要是苦于现代化不足和物质文明的匮乏，现代化问题至今仍然是海内外亿万华人难以解脱的心结。尽管我们应该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端，诸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精神文明堕落等，作为前车之鉴，应有所防范和

控制,但绝不可放松作为当务之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努力。否则,不仅会像营养不良的瘦弱者仿效脑满肠肥的胖汉去减肥一样可笑,还会使中国社会再次出现勉强跨越必经阶段而欲速则不达的状况。

(原载于《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期)

## 章开沅教授与中国近现代史写作

李平生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尤其是 80 年代初相比，当今历史学似乎面临着话语权削弱的尴尬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历史学论著写作而言，选题重复，观点雷同，文字艰涩，表述方式单一，缺乏思辨色彩，尤其是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历史学的应有功能，也影响了历史学的认知效果。事实上，历史学论著写作的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鲁迅先生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古人要求文章的考据、辞章、义理三者不可缺一，这都说明历史学论著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陈述的层面上，还应该讲究文采和思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历史学的写作状况，又应该如何提高历史学研究者的写作能力呢？带着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思考，笔者于 2002 年 10 月初借参加上海大学举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与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下面是根据录音和有关印象而整理的文稿。

李平生：中国史学“文革”以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言，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和当初你们那一代正当盛年的学者奉献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是分不开的。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私下讨论说，撇开学术观点不论，单就论文写作而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有三个写作大师，或曰写作高手，这就是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章开沅先生。如今，20年过去了，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都不幸作古，而您作为我们当年崇拜的三个写作大师之一，唯一的健在者，能否单从历史论著的写作角度，对当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以及当前的写作状况，发表一些评论？

章开沅：大师或高手之类的称呼我都不敢当。应该说，史学界不少人写过才华横溢、文采飞扬的好文章，你所提到的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的文章的确很精彩，可以说是流畅自如，引人入胜，我也非常爱读。前辈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关于内蒙访古的文章，应该属于散文精品；吴于廑先生晚年有关世界史的宏观论述，博大而又精深，至今仍为海内外学者所赞赏。我自己的文章毛病甚多，无非稍为注意语法修辞而已。其实，我在1949年以前的学生时代很爱文学，也很爱写作（包括写过一些诗），当年的文章比现在活泼，略有

文采而无矫揉造作痕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片面学习苏联，联共党史教科书也成了写作的经典，危害甚大。我们这代人不仅思想上受教条主义束缚，文风上也受那种不太高明的译文的影响，呆板平滞，逐渐丢失了自己本身的特色。“文革”以后，不仅思想得到解放，文风也得到解放，我这才写出几篇还使人看得下去的史学文章。记得80年代初我陪胡绳先生访美时，他很夸奖唐德刚教授的文章，主要是由于唐文挥洒自如，活泼而有趣。其实我们大陆学者的文学功底并不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文章高手差，但起先学苏联而受洋八股影响太深，后来又由于“左”倾思潮泛滥，大批判之风盛行，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无所不在，思想驰骋的空间愈益逼仄，文章也就越写越呆板。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很大损失。

现今很多中青年学者，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思想上的束缚较少，创新的勇气也更大，所以比较容易写出一些活泼流畅的精彩论著。但是，也有不少年轻学者，或由于缺少足够的文学修养与文字修炼，或由于学风浮躁、贪多图快而不注意文字的推敲润饰，所以写的文章缺乏文采，读之枯燥无味。当然，学术论文的内容是根本，但如果词不达意或条理不清，再好的内容也很难充分表达出来并为读者所理解。现在的学术环境比我们中青年时代好很多，希望中青年学者珍

惜大好时机，不断充实与改进自己，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

李平生：我在《文史哲》编辑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来稿，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教授、副教授的，也有博士生、硕士生的。坦率地说，这些来稿当中能够符合《文史哲》刊用标准者所占比例并不高。我仔细阅读来稿，发现他们并非用功不够，而是选题大都缺乏新意，以致花了很大的工夫却是重复了他人的劳动。依我偏见，论文写作的成功与否，与选题有很大的关系。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或者是切入点，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或者说会带来某一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下面，能否请您就论文的选题问题谈一些看法？

章开沅：选题当然很重要，读者看文章首先就是看题目。但就学术论著而言，选题似乎有两种：一是研究课题的选择，一是文章题目的选择。你说的大概是前一种选择，这也是学术论著成败的关键。焦裕禄有句名言：“别人嚼过的馍不香。”他讲的是亲自做调查研究的必要，学术研究也是一样，最忌讳的就是“炒现饭”。现今的研究生都懂得，在正式写论文之前必须做开题报告，其用意首先就在于通过集体讨论力求避免重复劳动。这并不是说别人做过的课题你就不能做，而是你必须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所前进，或者说有所创新。就

像陈寅恪先生强调的那样：“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史学研究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包括认真阅读重要史籍的文本，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确有原创意义的精彩论著。辗转引用“二手货”，甚至人云亦云、鹦鹉学舌，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应该属于打假扫劣的文字垃圾。

学术创新并非轻而易举的游戏。过去顾亭林写《日知录》，有时一年之间，“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所追求的是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是任何世俗的虚名。他把严肃的治学比作亲自“采铜于山”，而把时人草率“纂辑之书”比作“买旧钱以充铸”，既破坏了古人传世之宝，新铸之钱又极粗劣，此之谓“两失”。这层道理讲得深刻而又管用，所以我经常向学生转述。

现在人们都在大谈创新，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一定要对创新做深层的理解。创新不仅是个人的追求，而且往往产生于社会需要的驱动。不过从务实的观点来看，创新总要花费精力，讲究实效，不能玩花架子。所以，这种创新不能过多地从时间上来考虑，可以长，可以短。既然强调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追求其价值，不能急功近利。比如，当年在寻找改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时，因为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强调社会环境研究，结果就出现了商会研究。而商会研究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就

是有一大批商会档案被发现。没有这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来作为支撑，就无法开辟商会研究这个新领域和一系列新课题。

所谓的新课题不一定仅仅出现在新的研究领域，在旧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发现新课题。比如商会研究现在不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里面的新课题可多着呢！其中的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目前正时兴着，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虽然它的名称是古老的，但研究的角度和内容却是新颖的。它不但在近代历史的国计民生中产生过作用，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也将产生作用。从这样的角度研究商会，就不是进行一种简单的重复。研究新课题不一定要依赖新史料，即使根据旧史料或是一般史料，也可以写出有新意的好文章。过去李时岳在这方面是很见长的，他并没有刻意去使用新史料。当然，他也做过《龙华会章程》方面的考证，但他的特色不在于考证。过去陈旭麓也是这样，没有做过多的史料考证。倒是在史料方面下的笨功夫更多一点，以前写《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在北京图书馆泡了很长时间，又到张謇创业的南通实地考察，其中的艰辛且不细言。总之，研究进展取决于个人的悟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能力，就像同一首歌，一首老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唱法，有不同的风格，其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选题要求不能一概

而论，但创新要求则是必然的，否则就没有价值。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重复劳动问题，现在国外学者对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批评，尤其是对民国史某些论著的批评，主要也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也可能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阻隔，再加上不擅长外语，因而对国外学术进展的情况不了解，以致做了不少重复劳动。事实上，有些博士论文也存在重复劳动，个别新兴学科在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导师本身也不太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情况，无法指导博士生的选题进入研究的世界前沿。而老学科的情况则不一样，对老学科的带头人的要求毕竟是很高的，因为老学科原来的起点就很高。别的学科我不讲，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的批评就比较多，因为他们对这一领域的了解相对于其他领域要多一些，而我们的研究队伍在数量上很庞大，但真正高质量、有建树的学术论著并不多。

李平生：谈到选题的问题，我注意到有的学者的选题变换跨度较大。事实上，选题的变换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转移，而研究领域的转移有的时候是出于学术理路的自身发展要求，有的时候则可能另有原因。美国学者周锡瑞起初研究辛亥革命在两湖，后来研究直鲁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最近又在研究陕甘宁边区，其选题跨度变换较大。我也注意到，您早

年研究辛亥革命，成果斐然；后来您研究张謇，研究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并推动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最近，按您自己的说法，您又“半路出家”去研究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其间您还研究过南京大屠杀。此外，我还拜读过您最近写的《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一类的文章，注意到您正在思考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问题。出于好奇，我想知道您选题变换且跨度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章开沅：我尊重创新，但我绝不追逐时尚。我的研究领域转换，跨度并不很大，正如周锡瑞一样，我们仍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同一领域中变换研究课题。有些课题的更新，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如从现代化或商会史的角度重新解读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等。有些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如研究南京大屠杀，完全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挺身而出，驳斥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真相的各种谎言。至于近些年来参与讨论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仍是出于对人类文明当前面临严重危机的担忧，对人类文明今后走向的关怀，如果不嫌夸张的话，也是受一种潜在的责任感的驱使。至于研究教会大学史，那多少有些出于偶然，因为是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建议与策划，并非是我自己原有的计划。但这毕竟还是我自己的选择与决定，一是因为这个课题确实具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包括学术

价值与社会效益)，二是因为我还多少具备若干研究这个课题的条件。当代科技迅速发展，诚然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但相形之下精神生活却日趋庸俗乃至贫乏，表面的喧闹繁华掩盖不了许多人(包括某些达官富豪)内心的苍白空虚。而由于物质利益的强大驱动，人类不仅严重糟蹋环境(包括太空)，而且严重糟蹋自己，乃至年复一年地利用高科技手段自相残杀。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缄默无语。对于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乃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应该在世界论坛上听见历史学家的声音。我们无需妄自菲薄，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李平生：除了选题的问题之外，历史论文写作还涉及史料的运用。目前的历史论文写作，还存在着种种不良的现象：其一，有些论文缺乏过硬的史料来支撑其论点，全凭自己的想象而大胆地假设；其二，有些论文几乎全靠史料的堆积来说话，对史料没有透彻的消化，缺乏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提炼。还有一些论著在史料运用时出现了学术违规的现象，如转引他人材料，有时是第二手的，甚至是第三手材料，但不注明出处。据我所知，您的著作《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的材料被他人的论著转引，但转引者并未注明出处，这显然没有尊重您曾经付出的艰辛劳动。这种学术违规现象，不仅可能造成部分材料以讹传讹，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学

术风气。您能否就史料使用问题及涉及的相关学术规范问题发表意见？

章开沅：如果对史学理论进行探讨，或进行史学评论，可以不需要征引太多的史料，可以将已经发表的论著作为评判的对象；但如果是一种专题研究，或是对历史本身进行研究，即对史事进行研究，则必须运用史料，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本身所具备的一个特点，即需要史识的阐述和史实的实证来支撑。缺乏史实的实证，历史就变成一个空架子。黎澍在世的时候，对于那些空架子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反感的。过去史学界有许多抽象的、空洞的讨论，比如不管掌握多少史实，大家都可以谈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阶级基础问题。这种情况过去是很多的，现在看起来，写这些文章没什么意思。

关于史料的堆砌，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造成史料的堆砌，最主要的问题是写作者对史料没有真正的掌握。占有史料和拥有史料不是一回事。拥有是说手头有多少东西，而占有是指真正地把它消化了，或者是融会贯通了，这样史料才真正属于你。占有史料其实学问是很大的，现在有的人已经习惯于用电脑储存，或者是电脑检索，或者是缩微胶卷以及复印。这样方便是方便，但不一定容易消化。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史料的发掘如同开矿一样。地质大学曾经请我去做报

告，我说历史学与地质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们就相当于你们勘探队。不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铁矿就行了，对于铁矿的位置，处于哪个地层，矿脉怎么样，前后左右都要弄清楚，这样的勘探才有用。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根本就不注意收集原始材料，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自己掌握一本书或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现在的检索条件为这种剪贴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这种情况很多，但不可取。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要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跟日本一些右翼的所谓史学家进行斗争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些问题。我们找到好多材料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则从某个材料中找到某一句话，结论正好相反，他们就没注意到这话的前言后语怎么样，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在后面是不是又被否定掉了。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不好的学风跟日本右翼分子不是一回事情，但在这一点上有相近的地方。比如说随心所欲地运用史料，没有认真地做史料工作。事实上，史料工作不是一项机械的工作，而是一项高层次的智力劳动。并不是认得字（认字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现在有一些古文字，也不是很容易读懂的）就能够做好史料工作，而是要理解史料，驾驭史料。

李平生：有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的确面临着史料的限制，比如图书馆保存材料不是那么完备，或者有些档案材料由于档案馆的封锁，可能导致有些学者在从事某一个领域研究时，对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可能读到原文，只能通过别人的文章才知道，然后他就注明出处，转引这些材料，展开自己的相关论述。这种情况不应该属于学术违规吧？

章开沅：对，这不属于学术违规。转引材料是必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的资料，不可能完全不转引材料。转引材料，其要求就是不要失掉原意。有的人转引别人的东西，还故意贬低别人，这种现象也有。总的来讲，转引材料应该注明出处，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写的著作，很多材料也是转引别人的，如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有关材料，但他们对任何一条很小的材料都注明出处，这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

李平生：我在编辑稿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作者并没有真正地阅读原文材料，很多都是转引别人的材料，而又没有注明出处。对于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您有什么批评或者是忠告？

章开沅：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讲得很多了，外界对学风浮躁问题的批评，涉及的面很广，涉及的人也很多。造成这种

学风浮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责任也不完全在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还有一种政策的导向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的学术管理、科研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量化标准的问题，它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要求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必须完成什么东西。而且这种量化标准现在又和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包括待遇、工资、补贴等问题。这种量化标准要求人人都能做得那么好，的确是很难。所以从上级领导来讲，相关的部门还应该做自我反省，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这种自我批评。

对于不良的学风，对于违规者的责任，应该过问。这是一个治学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品德的问题。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德，他把德解释成为心术，这个解释很好。如果研究者本人看不到相关的材料或者只是参考别人的材料，他可以不写，或者在文章中完全注明出来，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是转引别人的材料。

我们还是回到量化标准的问题。现在这种量化标准在时间上要求过紧，客观上也造成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任何一个有突破性课题的完成，都需要有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有些管理者，他自己不从事学术工作，又不虚心听取学者的意见，热衷于量化标准，从而导致了許多弊端。现在每年都搞重大课题的招标，一般期限都是三年，既然这种招标的重大课题

三年就能完成，那还叫什么重大课题？现在有一些中标的年轻人很神气，因为他们手头都有一大笔课题经费。但是我心里好笑，你拿了一大笔经费，到了三年你怎么交账？现在大家实际上也是互相糊弄，随便找几个亲朋好友在一起，验收一下，然后就写个互相吹捧的验收报告，应付一下。上面管理者一看，高兴了，认为成果出来了。但这骗不过客观的学术价值检验。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导致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在瓦釜很多，即粗劣的赝品很多，而真正的黄钟即学术精品被闲置在一边，连人才都给毁了。这对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矛头向上，因为我做过学校的管理者，知道其中的一些弊病。我这些意见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

李平生：一篇堪称精品的好文章，需要有文学家的文采，史学家的功底，还需要有哲学家的思辨。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请您再谈一谈关于文采和思辨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篇历史论文如何体现文采，又如何体现思辨？讲到思辨的问题，这使我想到早在1987年我曾经采访过李时岳先生，当时他谈到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历史论文的写作，他提出做历史研究有时候是需要灵感的。而这种灵感，根据我当时的理解，它应该体现在或者可以表现出通贯全文的一种思想境界，或者也可以表现出文章的某些细微之处闪现一些思想的火花。

这种充满着灵感的文章，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时候陷入沉思，有时候则会心地一笑，有时候虽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也承认对方言之有理，自成一说，这是文章的灵感或者文章的思辨所能体现的魅力。同时，这种思想、这种灵感、这种魅力的体现有时候是和他的文采相联系的。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作为一个史学论著的写作者，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之外，在哲学上的思辨以及在文学上的修养方面应该如何再进一步提高？

章开沅：思辨，如果用史学的语言来表达，应该属于史识的范畴。按照史学家的区分，它应该是最高的一种层次，即进入一种智慧融通的境界。这是一个应有的追求。史识比史学更重要，此处史学系刘知几、章学诚所言“三长”之一，章学诚首重史识，而学、才次之。没有史识就等于没有思想，就是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没有深度，就是一般的陈述，而不能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史学在陈述方面也是能够见功夫的，史实陈述本身也体现着一种对史学的理解，但是应该有更进一步的、更高的理解，甚至进入一种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解，或是一种对宇宙生命终极诉求的理解，这是比较高的理解，但真正的史学家一定要有这种头脑。比如，陈旭麓先生用新陈代谢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他是在试探用一种哲学的规律来解析更深层的历史运动，从一个新的角度

来探讨中国近代史。但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新陈代谢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应该考虑。应该说，思辨对于史学家来讲，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很残酷的要求。因为它要求付出很大的代价，一种很艰苦的思索，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现在有些人在某一个专业、某一个领域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而我们现在提倡的是走出这个领域，比如《近代史学刊》卷首语，我写的就是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现在不仅是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还应该走出中国史；不仅应该走出中国史，还应该走出亚洲史；不仅应该走出亚洲史，还应该进一步超越，要把研究整个人类纳入视野。因为现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也都属于一部世界史，任何一部世界史也都包含着各个国家的历史。历史研究要有这样的追求，不能讲空话，要朝这个方向扎扎实实来做。首先是要求自我充实，自我扩张，这不是一种个人野心的扩张，而是一种知识追求的扩张。另外就是要求中外学者的合作。现在有一个小趋向值得注意，就是中、日、韩的合作，即东北亚的合作，因为这些地方相距很近，而且在学风上很相近，在历史研究方面都重视以实证为基础，跟欧美学者的学风不完全一样。就亚洲来讲，东北亚学者的研究水平是最高的，而在东北亚地区又以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为代表。其中韩国学者占很大的便宜，因为他们很

多人既懂中文又懂日文，但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大多都不懂韩文。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过去不太了解。只有在交往的时候，通过翻译，才知道他们的分量。他们很多工作做得不比日本学者差。我们的研究视野要走出东北亚，走出亚洲，走向世界。

另外，现在的史学家，要想提高史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要关心当前人类一些重大的问题，关心当前人类文明的深层危机问题，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初对历史学的定位就定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个没有宏观思考的、缺乏思辨能力的史学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司马迁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究天人之际而得出的结论还有许多神秘的东西。他在当时已属不易，他真正是个人修史，跟司马光不一样，司马光的著作还有那么多人帮他整理史料。现在有很多问题，比如人类文明缺失的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都需要予以关注。现在一些老一辈学者，甚至一些中年人已经在研究环境问题了。因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下级就跟着研究什么东西，而是自己应该密切地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甚至包括太空问题、宇宙问题，都应该考虑，这样才是

一个真正的史学家。环境污染不仅是已经污染地球了，而且已经污染到太空了，已经影响到宇宙了，这是生命与自然的终极问题。现在还有人类共同的、新的价值体系的营造问题，这也是历史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我认为都应该听见历史学家的声音。现在历史学家的声音太少而不是太多，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这类文章，因为我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写这类文章，但可惜太少。我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当然，作为个体的史学家，有若干学术精品，有一个专业的深度，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史学从整个学科来讲，应该在当前很多重大的问题上，在全球的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一贯主张参与史学。我主张的参与史学不是离开历史研究的参与，去把自己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离开历史研究，就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活动家。但是历史学家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被冷落的角落里，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主张“参与的史学，史学的参与”，现在台湾的一些同行，已经把这个口号接过去了，而且讲得更明确，变成“我们研究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现在某些研究成果已经

影响到政府的若干决策，比如宗教研究，而过去是不被认可的。历史学家现在一定要自强。

李平生：刚才谈到了史学的参与问题，这事实上涉及史学有没有主流领域的问题，更涉及史学是不是进入主流学科的问题。如果从现象或者某种角度来看，当前的史学应该说是正在被边缘化，比起 80 年代初的繁荣时期，目前史学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这种萎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现在我想讨论的问题是，这种萎缩的本身是不是与目前史学论著缺乏可读性，在写作手法、谋篇布局，尤其是语言表达方面缺乏一双灵巧的手有关系？顺便插一句，有人把一篇完美的文章比作一条精美的珠串，其中思想是线，材料是珍珠，而语言表达则是一双巧手。如果说，目前史学所处的边缘化的地位和史学文章本身缺乏可读性有关的话，那么怎样改变这种现状？或者说我们怎样去有意识地提高史学论文在写作中应有的一种文采？如何去培养史学论文写作者练出一双巧手？

章开沅：这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了。我觉得对于文字技巧，在一定时期予以强调是可以的，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因为史学家的文章写得再好，不一定会赶得上文学家、作家，但历史学家不应该原谅自己在文采方面的缺失，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改进，而且应有相当程度的、大的改进。现在应该是

大张旗鼓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文学通过电视、网络已经大举向历史领域“入侵”，而且很多是粗俗恶劣的“入侵”，史学家应该给以有效的回应。

李平生：现在的史学论著有一种趋向，即过于程式化、概念化、学理化，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相应的文采，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满足于在狭小的圈子里传阅甚至于自闭自恋，从而导致读者队伍的流失。

章开沅：关键是历史学家自身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因素，而历史学本身就是人文学科，文、史、哲就是人文学科的主干。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但作为一种形式的追求，形式的改进又是非常重要的。形式不是一个简单的包装，应该跟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产生一种内在的美，产生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来自其内心。这种内心就是一种本身的人文关怀，是一种营造的、文章本身的人文氛围，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内在美，即使文字写得再精美，那也是虚有其表的。但是如果没有刻苦的追求、刻苦的磨炼，就不可能运用自如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文字表达是一件很重要而又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几天写不出东西。李时岳用“灵感”二字来表述其中的奥妙，有他的道理。在文学创作上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作者苦苦思索，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思想内容，但就是没有适当的文字来表述，然后突

然有一天想通了，于是就下笔千言，才思泉涌。但这种灵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是靠长期积累的，属于厚积薄发。长期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遇到某一个契机，找到某一个突破口，产生了灵感，这就是论著写作最顺手的时候。这种顺手跟你文字的训练有一定关系，不然到时候你还是会感到很痛苦，因为你有思想却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平时要多注意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古文，也包括外国的文学作品，最好是多掌握几种外语，至少要掌握一种外语。我不仅阅读中国的作品，也阅读西方的作品。英文作品里面有很多杰作，有很多语法修辞跟中国不一样。我除了阅读一些历史著作之外，还阅读了很多其他的文学作品。我一个人在国外（主要是美国）住了几年，晚上看电视也是看美国的节目。专门有一个类似美国纪事的节目，把美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做成专题，不仅画面像诗，解说词也像诗。再就是看英文小说。我不一定都看得懂，也不愿一个词一个词地查词典，要的是一种美的感受。我觉得我的文字表达也得益于西方文学的熏陶。现在有些历史学家不屑于去下这方面的工夫，认为这是雕虫小技或者是一心不能旁骛，舍不得花这些时间。我觉得花这些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些中外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些人生、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很有深度，对史学家有启迪。现在文学在很多方

面都走在我们史学的前面。比如解释学，在历史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文学界早已有之。《文心雕龙》、经传、注疏，都有解释学。现在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开始引入西方的解释学，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固有的这类东西。我主张应该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跟西方引进来的东西融会贯通。

为什么有些史学文章使人觉得很优美，这是因为它们除了史识以外还有一种史感。史感，陈寅恪原来也讲过，但是我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情境里面。在斯大林那里有些认识就成了教条，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实际上他把时间、地点、条件变成抽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问题。史感，从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历史情境的体察。用动作的语言来讲，就是设身处地，只有如此你才能与古人对话。怎样与古人对话，也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发挥得很精彩。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一定的水平，也就不能或不配与古人对话。所以史学是很残酷的，这种残酷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史料的精确方面非常残酷。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讲过一句话：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即不能写历史上没有出现的事情，不能编造，不能歪曲，不能掩盖。其次，这种残酷指的就是对史感与史识的追求非常艰苦，这不是喝着咖啡敲击键盘一按就能出来的。这是那些高层领导、管理者所不能理解的学术甘苦。另外，很多人为眼前利

益所驱动，急功近利，这样写出的好文章就少了。要知道，营造一篇好文章是很艰难的。

李平生：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哲学著作是不分家的，有相通之处。就历史写作而言，作者除了应有历史学家的功底之外，还需要有文学家的文采，哲学家的思辨，使三者达到完美的统一。

章开沅：对，是这样。且不说过去是这样，现当代的史学精品论著也应该是这样。现当代一些史学理论大师包括英国的史学大师汤因比，他的作品是非常美的，而且有一种境界。我之所以强调史感，就是因为有些史学家成就很高，史识不缺乏，但史感丢掉了，或者说他们不是没有史感，而是没有把史感充分地显示出来。适当地强调史感，对年轻学人是有点启发的。你所提到的《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我当初写这篇论文时，要求自己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感受历史的氛围，通过对当年的文件、报纸、画报、历史遗址等这些内容的观看，使自己有所感悟。我看到那里照片上商会的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云蒸霞蔚”，四个字就把当时的气氛给点出来了。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氛，仿佛已经进入到晚清社会，否则很难能理解或感受当时的语境。感受语境就是要把自己设身处地地放在这个地方，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要不断地跟你写的这些当时的历史人物、相关人物，进行无声

的对话、交流、沟通，然后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当然，这对于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来说很困难，但作为一种学术境界的追求来讲还是应该的。

（原载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

## 章开沅先生访谈录

魏文享

由章开沅先生一手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坐落在华中师大桂子山的西边，绿意盎然的桂花树环拥着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术机构。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几乎每天上午，先生都会一路散步，从家里准时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虽然从事教研已经 50 余年，但先生依然在继续着他永无止境的探索。2003 年 6 月 25 日，在章先生幽静的办公室里，我就以下一些学术问题聆听了先生的教诲。

魏文享：章先生，您是国际知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据我所知，您的学术生涯也是由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历史作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研究到现在取得哪些突出成就？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史已经很难再深入下去了，您认为辛亥革命史是否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章开沅：初入史坛时，我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之所以后来转到辛亥革命史是受到一个事件的触动。1954 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说明了辛亥革

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一个外国学者能够不畏艰辛千里迢迢来武汉研究辛亥革命，一直身处武汉的我为何不能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所贡献呢？这件事情我在其他一些场合也提到过，应该是我投身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吧。当然，后来研究辛亥革命史并不限于武汉，而是放眼全国和世界。1961年，我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通过这次会议，我更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领地，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李秀成事件”，我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70年代后期，我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就辛亥革命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着手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本书出来后，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不过，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一个新的起点，起点的意义要更高一些。

到现在，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继我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之后，又出版了多部各具特色的辛亥革命史专著。国内外涌

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自 1961 年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会议以来，形成了每 10 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的惯例，至今已举行了 4 届。在新时期的开放环境和开放心态下，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也比较频繁。近 20 余年来，辛亥革命史在研究主题上有了较大拓展，除了对辛亥革命的性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辛亥人物等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外，关于民间社团、市民社会、人口、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可以说，辛亥革命研究已不局限于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到头了，难以再深入下去了。这种看法有些片面，当然，研究的难度和起点是增高了。2001 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就提出，辛亥革命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21 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将再创辉煌。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在发展的方向上，我主张有四点。一是进一步延展时空。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这个看法依然有效。二是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是说登山之乐，也是说治学的眼光。如此看来的历史才是动态的、丰富的、真实的。三是要深入社会生活，这一点目前已有学者注意，但还不够。不能单关注海面的泡沫，而要更多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给予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四是要继续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不可须臾或离。如能够做到这几项，相信辛亥学脉，可以世代绵延。

魏文享：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分不开的，但是单纯从革命视角来研究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您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呼吁加强“集团研究”“群体研究”，但在“群体研究”的同时，您也十分注重“个体研究”，如您对张謇的研究。请问：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如何结合？群体研究的思想给资产阶级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发挥了怎样的推动作用？您似乎对张謇研究情有独钟，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吗？

章开沅：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都是历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主体一方面是以群体形式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也会以鲜明的个体形象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会使历史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更明晰地凸现出来。在早期资产阶级研究

中，运用最多的是阶级分析法，往往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最多对其内部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方法仍失之粗糙。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我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集团研究应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的多样性得以充分展示，可以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对统一性的提示更为确切和深刻，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我强调了专题研究和省区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要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群体研究或者区域研究，提法不同，但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要根据历史真实，以多维视角看世界。“一管窥豹”当然显示了观察者的高明，但要窥全豹还是很难的，不容易做到。

可能多少是由于我的影响，集团和群体的研究方法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响应，曾经在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在国内是较早的，成就也比较突出。目前，

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上下求索，向下深入到商会更基础的组织——同业公会的研究，向上扩展到对 20 世纪民间社团的研究，近代商人团体的立体面貌不断丰富。此外，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于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于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事实上，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已不仅限于商会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扩大到不同阶层，官、绅、商、学，各自以自己的面目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它们又互动互联，形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群体研究的深入可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有更生动的认识，如关于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近代绅商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有着重要作用，由此探讨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公众领域问题，将历史问题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使历史的归纳与演绎更具有理论的自觉，也使理论的阐明在历史评判的基础上更为精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我也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 年，我们编写了《中

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不过，这并不表明群体研究的终结，历史研究方法始终都要求突破与创新。近年来，“新社会史”的观点兴起，虽然在什么是“新社会史”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在注重整体历史的同时，又关注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以自下而上”眼光观察历史进程等方面仍是共同的，大可留同存异，推陈出新，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道路上，以“状元办厂”闻名于世的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19世纪的最后一年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始，张謇在江苏通海地区办实业、办教育的大作为即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学术界研究其人其事的兴趣也经久不减，成果丰硕。我之所以始终关注张謇研究，细想起来，大概也是为这位晚清状元立功立言的丰功伟绩所吸引。张謇的特殊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耦合性，他不仅可以作为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经济思想变革的基点，也可以将其作为透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政治变迁、文化变迁及社会精英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变迁的观测点。我从1961年开始研究张謇，如果说张謇情结是指对这一研究的痴迷与执着的话，大概没有错。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时，我就考虑

另写一本《张謇与近代社会》。值得慰藉的是在田彤博士的协助下，这本书终于在 2001 年完成了。如果讲方法，也不妨说是个体研究法。这与群体研究并不矛盾，可以互为补充。

魏文享：章先生，您是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先行者之一，您为何从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关注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呢？怎样看待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呢？目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已取得了哪些成绩？应该在哪些方面加以改进呢？

章开沅：自 19 世纪末，西方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大学，其中基督教创设的有 13 所，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 3 所。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较早，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将教会大学单纯看成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或者称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这不太符合历史事实。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到教会大学史研究。1989 年 6 月，我们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之后国内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到现在，已经召开 10 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教会大学译丛》《教会大学史研

究》等论著，海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在研究队伍上，已改变了初期“喧宾夺主”的面貌，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港台及国外学者广泛合作的研究格局。

关于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比较复杂，一向也存在一些争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对教会大学的职能转变做些了解。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为早期教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提供配套的高等教育。这些大学有的是一个教派单独设立，有的由几个教派联合设立。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才得到迅速发展，学生人数扩张很快，增加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对教会大学的评价还是要坚持“两个区别说”。过去，国内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理性分析。在近代史研究中，在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研究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时代因素。为此，应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其次，还

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变化。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日渐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在抗日战争以后，很少有人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排除历史成见，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推进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

21 世纪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应该具有更好的条件。现在，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能够根据科学的研究，自由发表意见。当然，对教会大学的研究还是应该持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既要避免历史成见，也不能矫枉过正，不顾事实拔高研究对象的历史地位，这都不符合历史的求真原则。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个交叉性的领域，有学科的交叉，也有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通过交流促进研究的提升。现在，有不少博士学位论文以教会大学作为选题，或许可以期待在不久后就有重要成果问世。

魏文享：1994年后，您关于贝德士文献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国际关注，并推动了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掘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您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转移到抗战史研究的？您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能就抗日战争史研究谈谈您的看法吗？

章开沅：贝德士是我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代开始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50年。他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1盒，10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统称为贝德士文献。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资料。1988年、1991年我先后两次前往查阅。谈起整理贝德士文献的原因，大概与时势有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我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中，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1999年，我又出版了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求名求利，前面也说过，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历史的真实不容随意篡改，这条基本原则不能丢弃。事实上，有些正直的日本学者对于右翼势力的这种做法也十分反感。

近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投入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增多了，成果也更有分量，更注重挖掘国外的史料。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而且是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要还原抗日战争史的原貌，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光靠国际舆论，靠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最根本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研究，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让事实说话，让侵略者自己的行为去反击右翼势力的谎言。

魏文享：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史观，如您在《实斋笔谈》中对史魂、史学创新、史学参与等都有所论述。您认为史魂的核心是什么？在您的治学中，体现着鲜明的史学参与精神和创新精神，那么怎样处理文学参与和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的关系？新时期的史学应如何创新？

章开沅：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

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章学诚曾言：“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这种状况在今日之史学界并不少见。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公器。尽管史学在社会

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

在重科技轻人文的今天，提倡史学参与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因此与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并没有矛盾。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面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不能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是从学理上讲的，或许有的学者会认为太抽象。具体来讲，史学参与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实现，一是要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从这个角度看，我当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或可称之为一种参与，目

的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言论。在研究主题的研究方面，可以选择与现时代紧密相关的课题，在尊重事实、注重历史差异性的同时，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教学研究中，以历史教学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这也是一种参与。要以学者的识见，撰写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恪守学术规范，不搞粗制滥造，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这原是作为学者应遵守的基本准则，现在竟要屡屡重提，可见问题已十分严重了。这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要谈史学参与就难上加难了。

史学创新并无定法，但也并非无章可循，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空谈创新。因此，创新不是想象的，而是实践的。我自己的治学领域有多个，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了变化，由革命史研究，到群体研究，到现代化研究，内在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主体特征。商会研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研究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在一些年轻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这颗果实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资产阶级研究有所推进，也由此可以透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已非当初整理商会档案时所能料想的。教会大学史

研究大概独立性强一些，但由此发掘的贝德土文献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学术创新是实践的，是通过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理论的自觉才能够综合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作品。年青的史学研究者最好还是学有专攻，由此深入挖掘，不能声东击西，朝秦暮楚。也不能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的上升，或者盲目硬搬西方理论，导致食洋不化。总的看来，创新是实践的，是继承的，是突破的，是艰苦的，也是由专而博的，是厚积薄发的，是由浅入深的，是永无止境的。我这不是秘诀，贡献出来，也算是一种史学参与吧。

魏文享：您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创办人，有丰富的学术管理经验。据我所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一个普通的辛亥革命史教研室，而目前，这个研究所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所拥有一个团结协作、成就突出的学术群体。您认为要建设好一个学术机构的关键是什么？

章开沅：应该说，目前学界好的学术研究人才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能够搞好学术管理的英才。一个学术机构要永葆其学术生命，学术管理的好坏是关键。学术管理与学术研究是两回事，能够搞好学术研究不一定能够搞好学术管理，但搞

学术管理一定是要学术研究有所成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术机构与一般机构不同，虽然也涉及人事、经费等问题，但核心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目前，国内同领域的学术机构之间因为申请经费、课题的问题，相互之间竞争很激烈，这是好事情。但这种竞争不能单纯放在经费问题上，其重点仍在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成就，这个学术机构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从事学术管理也需要肯牺牲时间，肯奉献。傅斯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有天赋，但在学术管理上的经验尤为人所不及。他先后创办了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功绩也为同时期的学者所赞誉。不过，他也因此而耽搁了许多的时间，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因此，学术机构要管理好，发展好，需要管理者乃至全体成员有奉献精神。其次，学术机构要有较好的研究群体和学术梯队。大学要有大师，一个好的学术机构也需要有名师和大师。并且，不能仅靠一个人，要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专业结构、年龄结构上要配备合理，团结协作。此外，一个学术机构要有准确的学术定位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学术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研究队伍情况以及其他条件，确定自身的研究重点，在某些项目上集体进攻。既要鼓励学者大胆创新，开拓新的研究，但又不能散兵游勇，完全各自单干。这样，才能够形成自身的特色。与此相应的是，在保持优势的同时，

要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学术研究的重点，要有一些前瞻性的计划。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由一个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前进的。由辛亥革命史到资产阶级研究，早期现代化研究，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一大批青年学者在这些领域中成长起来，原有的和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开垦，这都是一个学术机构生存和壮大的沃土。当然，一个学术机构的管理涉及许多方方面面的事情，有些事情也不是学术机构内部可以解决的，有些方面涉及宏观学术管理机制的问题。就我看来，学术薪火得以延续，文化血脉得以搏动，这才是一个学术机构存在的价值，学术管理也应该以此为最终目的。

（原载于《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 ——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陈才俊

章开沅教授作为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史学大家与教育家，不仅在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卓然自成一家，而且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亦有宏博阐发。如他主张史学研究要“走进历史，理解历史”，“关心历史，参与历史”，“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强调治史者的“史德”“史感”“通识”与“圆融”；提倡宏大的历史观等等，都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雅礼协会前主任石达（John Bryan Starr）博士曾说：“章开沅教授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和教育家。”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前主席文德惠（David Vikner）博士则指出：“那些曾与章开沅校长共事过的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显示‘勇敢的意志去阐明自由的价值’的品格高尚的人。”自2004年9月始，笔者有幸追随章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基督教与教会大学史”方向博士学位，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与悉心指导，受益终身。特别是2006年8月底至9月中旬，更有难得的机会随先生前往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校

讲学，尤其发聋振聩。现根据平时对章先生的零星访问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如有挂一漏万或理解肤泛之处，纯属笔者浅薄所至。

陈才俊：很多年前，您在给朱英教授的著作撰写序言时说：“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而几年前，您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中又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请问您能否结合现实就历史的自身价值及史学的独特功用发表一些看法？

章开沅：“历史”二字，从字面而言，当然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本身，但从更深层次理解则为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以，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科学——历史学，显然既包括研究历史事实本身，又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出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有它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智慧的积累与储存，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遵循。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却是整个人类的演衍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它长于做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也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跨度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

暂的时段，而且往往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乃至整个历史的长河。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最起码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应该有全球的眼光，应该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社会上似乎有一种偏见，好像史学所研究的都是些故纸堆里的陈年旧事，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可以假史论今，关注现实，而且善于把握过去，洞见未来。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家虽然不是凶吉的预言家，但是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太多，这就包括一种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经常讲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现在虽然给它平反了，但习惯上人们仍然不大喜欢它。乌鸦就像鲁迅作品中所讲的那种人，人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了还要说人家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客人这样讲，主人当然就不高兴。这种事情很多，但我坚信史学的独特价值。历史学家不仅是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治史者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在人类文明业已病深、道德伦理严重缺失的今天，的确有不少我们的史学同行自视为弱势群体。客观上讲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却千万不能由此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所以，我提出史学应该自省，应该自强；主张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史学不应该在乎别人的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治史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青年人，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我这几年总在强调“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史学的价值。我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史学家！我之所以还要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要证明史学是有用的。当然，历史学家毕竟不是算命的，既不是星象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我们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中找出某些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带一点智慧性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史学界现在出现了某种自我迷失，那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许多人把史学最独特的价值与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

陈才俊：谈到史学的固有品格，古往今来，不乏名流贤达论及。唐代刘知几曾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

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清人章学诚进而阐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我们注意到，您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就刘、章二人的上述宏论引而生发。请您谈谈史学的品格问题。

章开沅：毋庸置疑，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一旦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求实存真是治史的基本准则，同时又是史家的最高追求，当然做起来亦颇有难度，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诚实作为史学的首要品格，乃该学科本质所定，亦为古今中外一切真诚史家之共识。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史学也是考证严谨、推演缜密的扎实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可投机取巧。

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尽最大可能搜寻相关的原始资料，有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的筛选辨析。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表现为要认真觅览原

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之学术成果的。而且，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只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还在于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以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析。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路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始终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却很难立于长久之不败。

治史诚然艰苦，但苦中又往往其乐无穷；治史者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可谓最大的愉悦。所以，伟大的史学家应该达到王国维所倡导的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章学诚之所以突出史德的重要，乃不满于当时滋生的腐败学风。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政治压力与金钱诱惑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君主专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学的忌讳乃至作伪，而商品

大潮的冲击则会诱发学风的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但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现今学风败坏尽管有多种因素促成（包括某些错误的政策导向、急功近利的学术评估机制），但一切真正的学者应该立场鲜明，坚守规范，道德自律，以大无畏的气概推动良好学风的重建。

陈才俊：针对现实社会中史学和一些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迷失，您曾经提出自己的“史魂”观，发出“史魂归来”的强烈呼吁，强调史学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才能求实存真，彰显自身的学术魅力。请您再阐述您的“史魂”观。

章开沅：我所说的“史魂”亦即章学诚所倡导的史德。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即已给史学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治史者只有穷“究”，只有会“通”，才能达至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铸造“史魂”。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所题词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许多年来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自己的学生。我认为不仅史学应该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而且

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优秀的史学不仅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真正的史学家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都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独立与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独立人格，才能获致章学诚所言的“秽史自秽，谤书自谤”的觉悟。当然，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尽管史学在当今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岂止一个！其实，我们的队伍正方兴未艾，蔚为大观。

陈才俊：您曾先后被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及关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可谓名副其实的国际知名学者。而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史学除了正在自我迷失之外，在国际上又往往表现为主体的“缺席”乃至批评的“失语”，已处于被国际史学界边缘化的困境。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章开沅：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事实早已存在，只是近些年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较多关注和反思问题的严重性罢了。梁启超曾说，学术乃天下公器。由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所以，为了史学的国际化，把外国优秀史学介绍进来，把本国优秀史学推向世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的史学若要走向世界，融入国际，我想首先是研究视阈的国际化。我曾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说过，现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属于世界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世界史又都包含着各个国家的历史。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要走出近代史，而且要走出中国史；不仅要走出中国史，而且要走出亚洲史；不仅要走出亚洲史，还要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作为研究的视阈与范畴。其次是研究手段的国际化。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理论与治史方法，而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期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与国际史学脱节，还抱持着一些老祖宗们几千年流传给我们的“家法”，所以自然也就被人家“边缘化”了。钱穆、余英时乃至黄仁宇、唐德刚这样的华人学者，还有以中国史为研究对象的费正清、李约瑟、史景迁、钟鸣旦等西方学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史学界的认可，与其研究手段的国际化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既不主张史学研究的全盘西化，亦非反对恪守传统，总之要取长补短，抑短扬长。最后是研究团队的国际化。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其他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样，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就一定要听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声音，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史学求实存真的品格。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这方面可能是走在国内前列的，如早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我们就注重了中美日学者的合作与交流；后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史以及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我们则携手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乃至欧美学者广泛参与。以前我曾经说过，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最近，我们发起的一个近

代东北亚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又由中、日、韩学者联袂担纲，也是研究团队国际化理念的又一实践。

现在有些人在某个专业、某个领域做出点成绩，就自以为是，沾沾自喜。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且国际史学是多么的精彩与壮观。史学研究如果还处于坐井观天之境，那是十分可悲的事。如今世界有关组织已经在着手给世界公民编写课本，我也有幸参与其事。他们认为我算得上一个世界公民。当今许多东西都已经全球化，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也在渐渐淡化，我们只有承认社会的多元化，承认世界的自由选择与竞争，历史才会向好的方面推进。我内心抱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青一代。

历史不仅是某一个民族独有的精神积淀，而且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其内核乃是天地之间、人际之间、国际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如今国际上的史学研究已从过去的以人为本，拓展到对环境、太空等跨越时空的历史的整体观照。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该肩负历史的重任与时代的使命，应该心系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前途。

陈才俊：有人曾说，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但是在我们看来，任何时代、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发展，都不可

避免地受到各种外在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乃至制约。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因素往往被有的学者视为史学研究的束缚。以您数十载的治史经历，能否对年青一代的史学爱好者谈谈如何面对意识形态及其影响？

章开沅：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这句话最早是胡乔木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宣布的。过去大家对胡乔木有些看法，他有自己软弱的一面，也有某些失误的地方，但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现在有很多回忆谈及这一话题。在今天看来，他并不是没有学术良知，也不是没有清醒的头脑，只是他当时的身份、地位不允许他讲更多的话。“文革”以后，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的致辞里讲了上述这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是非常称许的。在“文革”刚刚结束乍暖还寒之际，思想领域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以他的身份讲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史学跟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史学是生活在政治之中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史学本身不能泛政治化。史学、历史学家应该是超越政治的、超越民族的、超越国界的。我不是主张没有国家观念，不是主张没有爱国情操，但是史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是超越一切的，应该是保持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应该是真正的客观研

究，研究的结果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也不能只是由研究者自己作出判断，而是应该允许别人作出判断，更理想的是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这样的著作才是好的著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好多理论与我好像是想到一起去了，就是史学家不能以法官自命。你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特别是“三七分”“六四开”之类的，那都是笑话。哪有这么简单？好的东西里面也有坏的东西，坏的东西里面也肯定有好的东西。很早以前的古人，如王船山，就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简单的划分呢？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的，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不是也大有人在！林则徐一百几十年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容易引起历史学家的共鸣。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历史学家不要屈从于非学术力量的干扰，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金钱的。只有这样，才算是好的历史学者。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历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的确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微妙。本来，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

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但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的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是为某一政策的出台作“学术”注解。这种对科学尊严的肆意践踏，其痛苦更有甚于自己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对此处境，我只想唤起政治家们的注意，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科学，绝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什么工具。

似乎是刘少奇讲过这么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深深相信，如果出现对历史有不正当的政治干预，那肯定是暂时的，历史毕竟是由人民来创造的，也是由人民来书写的。所以，只有代表人民的历史学家才对历史有一个公正的结论。我也坚信历史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陈才俊：现在的学术界，不管什么学科，动不动则以“现代化”“全球化”等时髦话语来解读。我们注意到，以罗荣渠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做了许多理论上的创新，以您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做了一些实证性的探索。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史学界现代化研究中理论与具

体问题的关系？

章开沅：我认为现代化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不要把现代化乃至现代性作为唯一的研究路径，因为西方的后现代化问题提出以后，人们对现代化已经有很多新的看法。后现代化不是建设性的，它的贡献主要是破坏性的、批判性的，为此我们对现代化问题有很多新的反思。当然，现在西方对现代化批判得非常厉害，有人甚至认为现代化已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全球化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要仅仅局限于对古代史、近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的研究，也不要仅仅局限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主张对现代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细枝末节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观点。

的确，整个世界的历史变化很快，全球化的进程也很快。全球化是祸是福，现代化是福是祸，后现代化又应该是怎样，这是新的理论问题。这些新的理论问题不仅是西方学者要研究的，也是我们做中国史要研究的，甚至是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人未尝不可以研究的。当然，我们既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用现代化的理念来解读，也不能因现代化理论造成一些误读而因噎废食，对之全盘否定。因为史学的固有品格就是求实存真，实事求是。

罗荣渠先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并没有相互的约定，只是不约而同地做了有关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的现代化研究一直坚持下来了，他们是以世界史作为研究背景的，宏观研究做得很好，而且是对各个地区现代化的不同模式或者道路做一种诠释式的研究。应该说，他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群体。他们也曾经积极与我们联络，以求学术研究上的互补与共进，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后来中断了。我们本来想从一个不同的路径来深入研究现代化，就是以中国史为一个基点，特别是以中国近代史为重心，再跟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做一些比较研究，但是后来由于一些非学术的人为因素而中断了。原因之一是出版单位内部有人事纷争，许多书稿都退回来了，导致我们的研究无疾而终。

陈才俊：您一向主张史学研究的总体性把握，并进而阐发了“贵在通识”“追求圆融”的史学境界。可是，如今的青年一代学者所受的教育大多过于专业化、专门化，而且现在的史学发展有一种趋向，似乎研究的问题越小、越细，就越能显示研究者的水准。请您就这“专”与“通”之间的矛盾谈谈您的看法。

章开沅：其实你所说的“专”与“通”并不是史学研究中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你想想看，有哪位史学大师

不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又有哪位史学专家不是博学之士？我所主张的“通”，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若能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皆通，当然更是求之不得，不过这种人极少。

人类的历史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记忆，这些文化与记忆相互影响与运动，便构成了异彩纷呈而又深广复杂的历史图景。所以，要还原历史的本质，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对逝去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通识”。于是，我们在从事史学研究时，就应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观的理念与方法予以研究。史学实践一再证明，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相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才能彼此贯通，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凸显本真。反过来说，如果截取任何一个历史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相关人事错综复杂，互相纠葛，无论从哪里入手，均须牵涉其他各面。

司马迁早有千古名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文史通义》曰：“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此足见通识思想形成之早，意义之深。对史家之通识要求，梁启超、章太炎、钱基博、陈寅恪等诸大师，亦莫不注重。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一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通、东西南北通，即是通识的灵活显现。另外，近些年国内

外史学新锐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法或系统学方法，亦为通识的现代表述形式。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撑，所谓通识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史学研究如无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神韵阙如。

1949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于受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历史学科的授课内容与教学方法呆板划一，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学界开始注重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又因为受功利主义及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干扰，通识意识又趋淡薄。只有少数深刻领悟史学固有品格、严守力行历史学家神圣使命的学者，才能达致通识之境。

谈及史学的境界，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境界”一词源于佛教用语“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属于传统美学理念。而据我多年治史的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陈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王国维亦有精辟见解：“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我在治史的过程中，不断以融通自励，乃缘起于佛家之“圆融”。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而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陈才俊：2006年9月，您应邀前往西北诸高校讲学，多次提到“走近历史的原生态”这一命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共鸣。请问您这一命题的主要学术内涵是什么？

章开沅：走近历史的原生态，是我2005年10月在“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纪念苏州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中提出来的。近年来，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民族歌舞，为艺术的发展和 innovation 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从

中产生一些联想，将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主要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史学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

走近历史的原生态，首先表现为重视史料，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我一向主张对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任何史料的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其原生态。只有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仅仅依靠或主要依赖他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其次体现在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任何史学研究都涉及对历史对象的解释、判断与评价问题，研究者的最理想境界是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因素，保持价值的中立。历史研究的最终诉求是求真、求实，而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我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目，就是其真实状貌。

陈才俊：2004年11月，您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上做过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的点评人马明达教授非常钦佩地说：“在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中，章太炎先生与章开沅先生这两位大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共通之处。

他们不仅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培养出了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弟子，形成独特的学术门派。”您桃李满天下，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而言，提到桑兵、马敏、朱英、虞和平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请谈谈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章开沅：马明达教授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可讲得我有点坐不住了啊！他竟然拿我与章太炎相比，岂敢岂敢！不是崇拜古人，章太炎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可我是学无所成啊！我的学生中的确有些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成绩，也有人觉得好像是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怎么说呢？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可不能算得上名师。我现在有只眼睛近乎失明。学历史的人很多都是如此，从左丘明失明算起，史家患眼疾者甚众，包括现代的陈寅恪、白寿彝、唐长孺等，都是这样。这个话题不能讲多了，讲多了可能就有人不愿意学历史了。实际上，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受到眼疾的困扰。

谈到学生们的成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争气吧！如果说我起到了点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享有更多自由思考空间的环境。同时，我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外边更大的讲坛上，包括国外的学术讲坛上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自我表功，我本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学问家，但是我愿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帮助年轻学生更好地成长。同时，我主张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多视阈、

多维度、多元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所以，我的学生来源也比较广泛，既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又有来自不同人生阅历的，还有来自不同工作领域与岗位的。而且，我非常尊重学生个人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个人职业选择，不是要求他们个个毕业后都从事史学研究。这样一来，又有人将我培养学生的方法归言为“有教无类”。这我哪敢当！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讲自己能够做到的话，不讲自己做不到的话。我曾有一句话就是专给学生讲的：科学无禁区，如果你选的课题有争议，但又确实有价值，政治责任由我承担，学术水平归你负责。其实我至今仍需要顶住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包括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都很有压力。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像鲁迅讲的那样，年长者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走向光明的未来。

另外，我们培养学生，比较重视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提倡多开设讨论课。如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又发展了研究生论坛。这个论坛一直坚持下来了，不仅是本校的论坛，还发展成海峡两岸的论坛，很多人参加。这种论坛是很好的。实际上在我读大学本科时也有类似的论坛，但那时叫读书会，是学生自己组织的，不一定有老师指导。所以，过去很多有效的做法，我们

现在都在继续发扬，并且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

再有一点就是，我与学生保持很好的联系，或许可以称之为“追踪关怀”。尽管他们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很关心他们的，当然他们也很关心我。这些学生不仅学术上找我，就连他们家庭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问题也会找我。这也是我们很好的感情纽带。我讲这些话的意思不是别的，只是想说明我们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是师生之间既相互平等又相互关爱的队伍，而且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我也知道，有些人认为我对学生、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很严厉，怕我讲的一些大实话妨碍一些人的学术乃至事业上的前程，所以对我敬而远之。实际上，我这个人也很有人情味，大家不要怕我。

（原载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 编后

章开沅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力的历史学家。这里所说的思想力，是借用古希腊哲学家的概念：“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指思想的深度和力度，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坚守信念的意志。用中国古典史家的话说，就是达到了“史识”和“史德”的理想境界。

章先生的“史学之路”，是这种思辨力和认知力的最好体现。他在长期的治史路程中，既有微观的学术考察，也有宏观的理论思考；既承继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章法，也借取了西方经典的史学思想；通过科学而理性的学术探索，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治学风格。

如章先生倡导“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认为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这不仅揭示了史学的地位与价值，也召唤着史家的主体意识和时代情怀，充分地表达出了对史学生命力的极大信赖和期待。

近些年来，章先生经常讲的一个题目是：“史学寻找自己”。他甚而反躬自问：“史学在哪里？”这本小书即是以此为命题，辑录章先生有关史学理论与治学方法的部分文字。

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章先生对于史学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以及他的史家品格和大师风范。

（白水）

近代中國  
ModernChina.ORG